

改版致读者

送走硕果累累的2017，我们阔步走进充满希望的2018。

2018年，《连云港史志》要让你刮目相看！

它让你看到“新”！封面设计秉承历史文化严肃厚重的风格，同时提高审美品位，优化设计，呈现赏心悦目的效果。印刷方式由黑白印刷变全彩印刷，排版格式由单一变多样，文字为主，精用图片，增加悦读感。新增“党史论丛”“淮盐杂谈”“西游杂谈”“丝路新语”等栏目。刊期由双月刊变季刊，俗话说“好饭不怕晚”，多等一个月，多看几十页。

它让你看到“全”！《连云港史志》将进一步放开视野，稿件内容以连云港地区为主，同时吸收全国各地优秀史志成果。既有民主革命时期峥嵘岁月的再现，也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奋进足迹的留痕；既有连云港山水风光掌故的定格，也有各行各业精英楷模的风采；既有史志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有读史读志的心得；既有地情文化的探索发掘，也有对革命文化的抒怀胸臆；既有本地史志的工作亮点，也有“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现身说法。

它让你看到“深”！当前，连云港被省委明确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奋力开创“强富美高”连云港建设新局面已经成为530万港城人的生动实践。作为“资政育人”的利器——《连云港史志》将紧紧围绕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主动融入中心、服务中心，把宣传连云港地方历史文化置入地方发展大格局，深入挖掘历史上重大事件背后的精神内涵，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鼓舞和激励全市人民满怀豪情奋战“十三五”，建设美好家园。

总之，从今天起，《连云港史志》让您换一种看法，看到知识和文化，看到信仰和希望，看到历史和未来。

LIANYUNGANG SHIZHI

连云港史志

2018.03 1 总第115期

- ◆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 ◆ 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准印证号 苏新出准印 JS—G033 号

出版日期 2018年3月

编委会主任 徐勤飞

编委会副主任 张 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 鹏 白植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平 王 淙 王 滨 刘 鹏 刘再军 邱仕明

张再楼 胡卫星 姜龙才 郝 芳 徐 玲 成苏洋

韩翠林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古龙高 刘畅征 许燕鎏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 云 韩世泳

目 录

CONTENTS

本期特载

04 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滕 雯

09 在《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连云港篇》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黄远征

党史论丛

12 毛泽东与山东战场 /茅永怀 曹骅 茅运宏

18 刘少奇与滨海区的减租减息运动 /王晓华

港城精英

23 海属革命的先驱——惠浴宇 /成 文

峥嵘岁月

26 一位灌河老战士的足迹 /张 沂

地名故事

31 寻找“银山” /韩世泳

淮盐文化

36 淮北鹾韵妆云台 /胡可明

西游杂谈

40 《西游记》中的“祭赛国”与“金光寺塔”原型探析 /蒋金明

主 编 徐勤飞

执行主编 魏 鹏

执行副主编 邱仕明 刘 鹏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于冰清

责任校对 张骏鹏

编辑出版 《连云港史志》编辑部

地 址 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69号A楼

电子信箱 lygshitan@163.com

邮 编 222006

电 话 (0518) 85825137

承印单位 连云港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图片：连云港火车站

位于连云区中山路北下侧。始建于1933年，建成于1935年。西洋式平顶建筑。钟楼设于东端，远视如船形。办公楼四层，钟楼十层（含地下室），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占地1170平方米，实用面积3000多平方米。该楼原为连云港港口和车站的共用办公楼，由原国民政府陇海铁路管理局承包给南京复兴公司下设的方纪公司负责施工建造。该楼是连云港建港初期建筑之一，对研究连云港港史、连云港市经济发展史和中国海港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苍梧史话

- | | |
|------------------|------|
| 44 云湖回忆——徐圩史话 | /张树庄 |
| 49 从赣榆走出的三国名将唐咨 | /徐 亮 |
| 53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六） | /刘凤桂 |

谈志论鉴

- | | |
|-------------------------|------|
| 57 “一带一路”视野下地方志工作的供给侧改革 | /陆瑞萍 |
| 61 地方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用及路径浅析 | /郭 云 |

资政研究

- | | |
|-------------------------|------|
| 66 对灌南县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思考 | /韩翠林 |
|-------------------------|------|

港城记忆

- | | |
|-----------------------|------|
| 69 韩培信与连云港对虾承包养殖 | /吴乃华 |
| 71 连云港至大连客货班轮航线的开通与停航 | /薛广东 |

风物揽胜

- | | |
|-------------------|------|
| 76 赣榆文峰塔 | /葛永明 |
| 78 园林寺——九庵十八庙寻踪之七 | /孙大伟 |

史丛一得

- | | |
|--------|------|
| 80 摆架子 | /潘友国 |
|--------|------|

编者按

2018年2月9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滕雯同志对2017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2018年的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滕部长的讲话总揽全局、立意深远、高屋建瓴，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本期特摘编滕部长讲话中关于2018年工作方面的内容。

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节 选）

□ 滕 雯

同志们：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部署要求，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着力提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着力提高连云港文化软实力，着力加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的建设，为建设“强富美高”连云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连云港实践的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具体来讲，今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着力抓好“六个一”：

一、紧扣一个主线——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

（一）理论学习培训拓展深度。一是大处着眼抓覆盖。按照“全党来一个大学习”的要求，广泛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推动全体党员干部明理明道、入脑入心。二是细处着手抓

重点。以县处级以上领导为重点，制定专题学习计划，开展“学习十九大精神、建设美好连云港”专题读书调研，推动中心组成员带头学、写、讲。三是实处着力抓效果。健全完善旁听、督导、通报、检查“四项制度”和述学、评学、考学“三个办法”，更深一层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实施细则》。

（二）理论宣讲解读保持热度。一是两论并行、统筹发力。推动市主要媒体组织重点理论文章，打造特色理论栏目。二是新老并用、贴近群众。巩固用好“港城大讲坛”“苍梧讲坛”等传统平台，打造“基层理论讲习所”“基层宣讲示范点”等一批新阵地，成立“百姓名嘴”宣讲团，走村串巷开展“学习十九大拥抱新时代”等主题宣讲活动。三是分众传播、靶向讲解。把理论宣讲“漫灌”和“滴灌”结合起来，积极探索“草根宣讲”“文艺宣讲”“微宣讲”等接地气、有活力的特色载体，让党的创新理论“动”起来、“活”起来。

（三）社科理论研究对准精度。一是围绕大局抓课题。突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事关全市发展的重大课题，引导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和相关智库深入开展实务研究。二是找准路径抓落地。形成一批对决策有实际参考价值的智力成果，用《决策内参》等形式报送市委市政府参阅，推动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应用转化。三是放大效应建智库。加强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连云港）研究基地、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研究基地等平台建设，用好市首批重点智库，深入开展课题攻关、政智对话以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努力提供更多既解思想扣子又指发展路子的高质量成果。

二、强化一个抓手——深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一）完善知责明责的“责任链”。一是明确党委主体责任范围。各级党委（党组）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切实担负把握正确方向导向、壮大主流

思想文化、加强网上舆论工作、管好意识形态阵地、处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加强工作队伍和党员干部管理等职责。二是推动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守好自己的门、站好自己的岗，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其他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部门、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三是层层传导压力落实责任。在抓好本级本部门主体责任落实的同时，还要全面掌握下一级党委（党组）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情况，加强督促指导，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防止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

（二）高举督促考核的“指挥棒”。一是树立鲜明考核导向。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全面纳入党委（党组）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年度述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目标考评体系。二是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今年市委将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制定《党委（党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各地各单位也要着眼“督实”“考准”，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从抓基础向抓精准逐步延伸。三是强化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各级宣传部门要履行指导、组织、协调、督查和抓好落实的职责，每年对本地区意识形态工作至少进行一次专题督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全面纳入巡视监督范围；各级组织部门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全面纳入干部考核。

（三）种好阵地管理的“责任田”。一是严管新闻媒体阵地。全面落实党管媒体原则，按照“两个所有”要求管好新媒体阵地，一切具备媒体属性和传播功能的平台，都要纳入党委统一管理，按照党的要求开展工作。二是严管思想理论阵地。对各类报告会、讲座主讲人员和内容严格报批审核，严格课堂教学管理，严密防范校园传教活动，决不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三是严管文化传播阵地。严格执行文化市场管理法规和制度，深入开展“扫黄

打非”斗争。

三、聚焦一个主业——不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氛围

(一) 在新闻宣传上聚好力、鼓好劲。一是做深重大主题宣传。精心设置“贯彻落实十九大、一把手话发展”“十九大一港城大作为”等选题,开展“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高质量发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重点工作组织系列宣传战役,为推进全市中心工作鼓劲加油、聚力添能。二是做响发展成就宣传。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连云港解放70周年等时间节点,策划“四十年·四十人”“学习贯彻十九大,改革开放再前进”等大型新闻行动,全面展示全市改革开放的实践轨迹及发展成就。三是做强新闻策划协调。组建市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小组,完善新闻通气制度,统筹动态指挥调度全市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等宣传报道。加强新闻发布工作,推动实际工作部门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发布和及时发声、主动发声。

(二) 在网络管理上站好岗、尽好责。一是网上传播方面。围绕中心工作精心设置“领航新征程”“改革印记——人·景·年”等议题,强化“连新策划营”建设,打造“网信连云港”沟通平台,组织开展互联网公益创投大赛等特色活动。二是网络党建方面。依托连云港市网络传播协会等成立全市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及其党组织,着力画好网络同心圆。三是网络管理方面。强化网络意识形态按季度分析研判报告制度,创新网络执法机制,加快推进市县(区)委网信办机构建设,落实网络属地管理责任,深入开展系列净网专项活动。四是应急保障方面。筹划建设市互联网应急指挥平台,加大与省委网信办、县区板块的纵向联动,加大与市直各单位的横向互动,加大与市内外媒体的双向沟通,及时有效处置网上重大舆情。五是队伍建设方面。建好“网络连军”、新闻采编队伍和自媒体小编队伍,

让更多的连云港原创元素闪耀全国全省。

(三) 在对外宣传上谋好篇、布好局。重抓“五个一”:一是完善一张工作网。加强对全市外宣工作的整体设计,构建大外宣格局。二是实施一个大行动。围绕连云港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策划实施“连云港:‘一带一路’朋友圈”新闻行动。三是打造一本口袋书。围绕山海文化、西游文化、水晶文化、徐福文化等特色文化做文章,推出《山海风韵连云港》外宣手掌书。四是制作一部纪录片。联合央视《发现之旅》栏目,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制作刊播《改革画卷前沿明珠:连云港》专题纪录片。五是拍摄一个形象片。即有效融合连云港“城市规划+特色乡镇+文化标识+旅游资源+典型人物”等元素,用高水准的城市形象片勾勒连云港人文和发展之美。

四、聚力一个任务——营造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环境

(一) 用先进典型释放价值感召。一是留存大写的“时代注脚”。力争年内再推出3~5个全省、全国重大典型。二是扮靓最美的“城市底色”。编好用好《榜样力量港城温度》干群教育读本,成立“最美人物”展示长廊、工作室,广泛开展“新时代青年行”宣讲展示活动。三是记录多彩的“美德光辉”。今年是“美·德照亮港城”举办五周年,要精心谋划,结合面向全国征集主题曲以及承办“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连云港)现场交流活动,把第五届颁奖典礼办出特色和影响,办成在全国叫得响的城市公益名片。

(二) 用道德实践凝练价值导向。一是生动讲述暖人心扉的好人故事。召开“新乡贤与道德风尚建设”现场观摩会,推动“好人工程”“核心价值观铸造工程”全面布点、普遍开花,广泛开展“学习宣传全国道德模范方敬”“道德楷模讲一课”等特色活动,让榜样的力量转化成群体效应。二是着力巩固德者有“得”的礼遇机制。发挥道德风尚基

金作用,明确政治礼遇、资金奖励、节日慰问等具体措施,构建“道德风尚建设突出贡献人物”帮扶宣传奖励机制。落实志愿服务回馈奖励办法,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联动机制,巩固提升诚信经营“十百千”创建成果。三是用心浇灌阳光向上的“美丽花朵”。深化未成年人“八礼四仪”养成教育和“童”字系列美育活动,组织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实践、“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等活动,持续立“德”、塑“美”、践“礼”、育“心”。

(三)用文明创建增进价值认同。一是坚持制度推动。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为引领,通过出台《连云港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创文问责办法,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制度化。二是坚持全域联动。以市本级主城区为核心,东海、灌云、灌南三县同步发力,把创建工作落实到每一个主管部门,延伸到各街道、社区和每个基层单位。三是坚持活动带动。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为着眼点,把创文十大联动项目、“一月一主题”“文明创建一起来志愿有我更精彩”等活动办出影响,增强市民参与感认同感。持续深化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三大行动”,真正让文明有礼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五、顺应一个变化——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打造更多文艺扛鼎之作。一是深入生活、服务群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的重要指示,深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努力使作品充满生活色彩、富有生活气息。二是潜心耕耘、打磨精品。要立足“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标准,紧紧抓住创作生产这个中心任务,以市重点文艺创作专项资金为杠杆,发挥花果山文化奖的引领作用,聚焦作品质量提升,携手央视、央广以及国内名家,努力推出一批港城烙印鲜明的大戏大剧精品,全力冲击

省级以上重要奖项。三是加强策划、打造品牌。努力办好改革开放40年主题文艺晚会、第四届文化艺术展示季、第三届戏剧节等品牌文艺活动,体现地域特色和浓厚氛围。

(二)提升文化改革发展水平。一是持续推进文化改革创新。完善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落实《连云港市国有文化企业主要负责人业绩考核办法》及《薪酬管理办法》,支持市属国有文化企业推进机构、薪酬、绩效改革,深入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提升执法成效。二是着力构建文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市内外相关文化资源,推动“创业英雄汇”活动成果落地,打造集创意设计、创业孵化、展示服务、金融扶持等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重点建设“三中心一空间”(文化创意设计中心、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文化要素保障中心、文化创业孵化空间)。三是加快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深度对接市场,实施“文化园区建设、上市企业培育、品牌活动打造”三大行动计划,不断提升我市文化产业规模和发展层次。

(三)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一是扎实推进历史文化名城申报。保护好各类历史文化遗存,传承好各类民间艺术、非遗项目。加大戏曲保护传承力度,全面推进淮海戏、五大宫调等地方优秀戏曲进校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风采。二是建好用好公共文化设施。规范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运行管理,提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管水平,探索数字化网络化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推进资源整合,提高服务效能。三是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广泛开展千场戏、万场电影惠民展演展映等活动。深化“书香连云港”建设,结合文明城市创建,打造一批图书漂流屋“样板工程”,选树一批阅读新空间、阅读组织和农家书屋示范典型,造浓全民阅读氛围。

六、狠抓一个工程——全面加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的建设

（一）在政治上硬起来。一是政治方向要明。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立场、方向、原则、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政治定力要强。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当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发声和斗争。三是政治生活要严。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制度化常态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奋斗精神。

（二）在责任上担起来。一是守好各自“责任地”。各宣传文化单位党组织和领导班子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紧紧抓在手上，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切实做到领导班子负责“不松手”、一把手尽责“不甩手”、班子成员担责“不缩手”。二是织密制度“铁笼子”。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建工作各项制度，完善党建工作制度体系，夯实长管长严的制度基础。三是用好问责“杀手锏”。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广泛开展警示教育，对于抓而不严、不抓不管导致问题突出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三）在作风上严起来。一是带头树立良好形象。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四风”特别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市贯彻落实的具体办法，推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驰而不息地抓好作风建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地祛除“四风”。二是带头走好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提升政治站位、提高工作

能力，在真心实意向人民学习中拓展工作视野、丰富工作经验，在倾听人民呼声、虚心接受人民监督中自觉进行反省、实现自我教育。三是带头传承优良传统。永葆共产党人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用历史启迪今天、用初心坚定方向、用奋斗书写辉煌，以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圆满完成党中央和省市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四）在本领上强起来。一是按照政治家的要求配班子。突出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的政治标准，做好宣传文化单位重要岗位和重要宣传舆论阵地领导干部选拔配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不动摇。二是按照专家型的要求抓队伍。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大学习”“大练兵”“大比武”，练就“几把刷子”，掌握看家本领，真正成为行家里手。三是按照全媒体的要求育人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对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与不同职业背景和文化层次的群众打交道，既要是新闻宣传的专家，还要是各种学科的杂家，集多种能力于一身，会使“十八般兵器”。四是按照笔杆子的要求练笔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某种程度上是文字性工作，要以扎实的文字功底为基础，以简洁的文字传达深厚的内涵，努力烹制出“人人眼里有、别人笔下无”的大餐。五是按照开拓者的要求促创新。围绕贯彻十九大精神、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我们今年将组织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大调研，大力推进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创新创造，努力把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得更有成效、更得人心、更加出彩。

同志们，在路上心中才会有时代，在现场心中才会有感动。我们要在中央和省市的坚强领导下，深刻认识新时代，准确把握新方位，积极投身新实践，不断展现新作为，为建设“强富美高”连云港、谱写新时代连云港改革发展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在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连云港篇 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8年1月12日)

□ 黄远征 (副市长)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连云港篇》编纂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省、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连云港篇》编纂任务顺利完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加强修史修志”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地方志工作定位更加清晰、要求更加明确、顶层设计更加完善。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省委娄勤俭书记到江苏上任伊始就调阅各地方志，从中了解古今历史，熟悉江苏地情。去年11月8日，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就编纂《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根据《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编纂工作方案》要求，

我市要提供援藏援疆建设内容。为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连云港篇工作方案》。刚才，徐勤飞主任对编纂工作方案作了介绍，几家单位作了很好的发言，总体我都赞成。下面，我讲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充分认识编纂援藏援疆建设志的重要意义

对口援藏援疆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20年来，我市坚持真情、科学、持续的理念，扎实开展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工作，共选派37名优秀干部进疆工作，投入援疆建设资金近亿元，有力推动了新疆伊犁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

发展。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编纂《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连云港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编纂援藏援疆建设志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任务。作为援藏援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全面记述我市20年来对口支援新疆伊犁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我市自1997年开展援藏援疆工作以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新疆伊犁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早期一些援建干部有的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较差，有的援建项目也已毁损。及时编纂援藏援疆建设志，系统、准确、翔实地记述连云港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及西藏建设的各项计划、措施、成就，总结经验，留存历史，启迪后人，既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

其次，编纂援藏援疆建设志是增进民族团结和地区交流的桥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对口支援20年来，连云港干部群众与新疆伊犁和西藏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情同手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谱写了民族团结的新篇章。我们不仅要共同创造历史，更要共同记录历史。编纂好援藏援疆建设志，完全符合中央的决策部署，完全符合全国对口支援西藏新疆有关会议精神，必将为加强民族团结和地区交流留下重要历史见证。

第三，编纂援藏援疆建设志是推动经济文化强市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支撑。我市在援藏援疆工作中，积极争取政策，提升产业规划，强化招商引资，促进连云港与伊犁的互补发展。随着经济援建的不断如强，文化援建与交流越来越显得重要。及时收集整理对口援藏援疆资料，并将之编成志书，全面记录我市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扩大合作交流、

在深度交往交融中实现更大发展的奋斗历程，对于继承和弘扬援藏援疆精神、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以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编纂援疆建设志

党的十九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的首要政治任务。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援藏援疆建设志连云港篇编纂方案要求，认真抓好落实，确保编纂工作高质量有序推进。

一要明确总体要求。编纂工作中，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用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坚持正确方向，依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等规定，全面落实中央对口援藏援疆工作的部署要求，严把政治关、史实关。要坚持质量第一原则，树立精品意识，存真求实，确保编纂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志书成果。

二要突出记述重点。编纂援藏援疆建设志，社会关注度高，历史影响久远。要全面客观记载援藏援疆的基本原则、思路理念、决策部署、力量组织、政策制定、项目实施、监督检查、援建方式等情况，系统总结我市突出改善民生、助力脱贫攻坚，突出增加就业、推进产业援建，突出培养人才、强化智力支持，突出民族团结、加强地区交流等成功做法，努力打造具有连云港特色的援藏援疆精品佳篇。

三要挖掘先进典型。20年来，我市广大援藏援疆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工作、无私奉献，为维护受援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突出贡献，树立了连云港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受援地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尊重。要通过编纂好援藏援疆建设志，深入挖掘他们的先进典型，积极

向宣传部门、新闻媒体推介他们的事迹，传承弘扬他们的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凝聚起建设“强富美高”新连云港的正能量。

四要创新记录形式。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结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做好影像志工作的意见精神，在编纂好援藏援疆建设志文字版志书的同时，可考虑采用更先进、更现代化的记录方式，在有关单位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下，以影像形式呈现历史场景，留下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有人物的鲜活记忆，全面直观地展示连云港援藏援疆取得的丰硕成果。今后，各援建单位也要注意及时整理保存影像资料，以备将来使用。

三、切实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

编纂援藏援疆建设志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多、专业性强、工作量大、工作周期长。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强化举措、明确责任，确保编纂工作顺利推进。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做好编纂工作，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市里成立了由项雪龙市长任主任，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副主任，市相关部门和单位、承担支援任务的县区政府以及市对口支援伊犁前方工作组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编纂委员会。编委会下设综合组、资料组、编写组，分别设在市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委和市地方志办。市发改委要积极承担起资料征集工作重任，主动向各支援单位征集资料，及时提供给市地方志办。市地方志办作为编纂工作的责任主体，要严格执行编纂工作方案，抓紧细化编纂计划，研讨篇目大纲，做好业务指导。要主动与各承编单位沟通联系，开展撰稿培训，及时协调解决编纂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市有关部门和单

位、对口援建工作组和各县区政府及对口支援单位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配齐配强编修队伍，抓好组织协调，全力支持配合，共同做好编纂工作。

二要强化统筹协调。援藏援疆建设志内容丰富，从组织发动到具体实施，从经济建设到社会民生，从前方指挥到后方保障，涉及方方面面，这需要发挥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同心协力，众手成志。市发改委要协调市相关对口援建部门做好有关资料收集工作；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市广电总台要积极参与，谋划拍摄制作影像志；有对口支援任务的县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要切实参与这项工作，督促指导有关部门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各对口援建工作组要做好前后方和受援地的沟通衔接工作，抓紧收集受援地文字、图像资料，配合支持拍摄各类影像资料。

三要确保编纂进度。按照工作方案，《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连云港篇》今年9月份要报送至《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编辑室，可以说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参与这项工作的市各部门各单位、各县区党委政府、对口援建工作组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个部门或单位的编纂工作如果不能按计划推进，都有可能影响连云港篇的如期完成。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务必要树立全局观念和“一盘棋”思想，按照工作方案的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精心组织，创造条件，扎实推进，及时完成工作任务，确保编纂工作顺利推进。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定期通报情况。

同志们，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编纂好《江苏援藏援疆建设志·连云港篇》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以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诚协作、攻坚克难，优质高效地完成编纂任务，以优异成绩向市委、市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毛泽东与山东战场

□ 茅永怀 曹骅 茅沅沅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开始从中国的革命舞台上崛起，并以其日益突出的地位和能量影响着全国的战争态势，决定着中央的战略布局。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山东从一个敌后沦陷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全省性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高度重视山东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总是把山东战场放在全国革命的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周密部署，精心指导，为山东军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倾注了大量心血。

高度重视，调兵遣将， 布局山东抗日战场

1935年，日军直逼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面对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经过长征刚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在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1936年8月，他致信东北军将领、当时主政河北省的宋哲元：“鲁韩（复榘）绥傅（作义）晋阎（锡山）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毛泽东的战略目光开始从西北转向齐鲁大地。

1937年春，毛泽东到招待所看望到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指示：“山东是有基础的。当前一定要搞好统战工作，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

7月，全国抗战爆发，毛泽东提出开展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抗日战略方针。9月，八路军3个师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要求发动全华北的中共党员，动员民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而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在电报中，毛泽东特地点明“包括山东在内”。就在这个月，中央派出一批红军干部秘密到达济南，经省委分配到各地，参加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在日军主力南下时，毛泽东判断日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徐州，下一步还会再向南，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决定利用日军主力南下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的这个空当，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12月，毛泽东致电朱德，提出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随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干部前往冀东及冀鲁边区，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

毛泽东对山东战场的重视与关注给予了中共山东省委极大鼓舞。经过精心部署，山东各地党组织抓住时机，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

1938年4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黎玉关于山东情况的汇报，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你们能抓住时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要求中共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黎玉请求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认为：“一个团是不

够的。看来还要多去一些。”当日，他还致电时驻武汉的周恩来：“山东书记黎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70人发展至1200人、800枪。”5月6日，毛泽东又特别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上意义重大，决以张经武同志去山东。”他充分肯定了山东的抗日武装起义，还在延安的一次高干会上高度赞扬中共山东省委所做的工作。

6月，中共山东省委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规划，并报请党中央批准。毛泽东在复电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山东省委所制订的战略计划，希望按这个战略计划去实施。从此，山东开始了有计划地全面创建根据地的新阶段。

当时，起义武装在山东大地风起云涌，各抗日武装名称不一。毛泽东敏锐地看到，这种不统一对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他于6月6日电示：“山东的基于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番号，目前可组成四至五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名义出现，用抗日联军名义不好。”此电报发出后，仍感不放心，8日又发一电，强调：“凡属我党领导，已取得广大群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

根据徐州失守后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重组中共山东省委。数日后，又决定将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8月，根据毛泽东“派一批军政干部到山东工作”的指示，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在延安组建，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这是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的前身。

张经武、黎玉率领的这个精干的纵队领导机关，于11月中旬抵达鲁中。12月27日，在鲁东游击纵队领导机关的基础上，山东纵队（简称山纵）在沂水县西部的王庄宣告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所属部队整编为10个支队，另3个团，共25个团、24500人，还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

山纵的创立,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给徐向前、朱瑞、黎玉的电报中这样说道:“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此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改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仍为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建立起沂蒙山区、清河区、胶东蓬黄掖地区等3块抗日根据地以及鲁南、湖西、泰西、鲁东南等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到1939年底,山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日、伪军4.1万余人,收复城镇20个。山东八路军(含冀鲁边区和鲁西北地区)已达近6万人,党员总数达1万余人。

建立政权,发展武装, 打造稳定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一切军事斗争的目的在于政治,政权则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形式。早在1939年5月,毛泽东、党中央即指示山东“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政权”。11月,又进一步明确要求“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否则是不可能的”。因此“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根据上述方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之下,一步一步的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抗战初期,山东党组织手中既没有几支枪,也

没有一个村级政权,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依靠,党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山东党组织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精神,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发动群众,开始在县、区、乡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将政权逐步改造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行使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工具。到1940年夏,正式建立了基本以一省的行政区划为主体的山东抗日根据地。至年底,八路军第115师发展到7.6万人,山东纵队发展到5.4万人;行使政府职能的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正常运转,还成立了两个行政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和79个县政府,党员发展到11万多人。

为进一步发展山东抗战,毛泽东多次提出派主力部队去山东。

早在1938年2月25日他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提出了“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区为根据地”的思想。当黎玉向毛泽东要求派一个团的主力到山东时,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一些。”这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派兵去山东”。12月,八路军第115师第685团即到达山东湖西地区。翌年3月1日,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进入山东。在此前后,八路军其他主力部队为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也相继到达山东,极大地增强了山东的抗战力量。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就山东的军事工作、根据地创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作出指示。他在《对山东的军事工作的意见》电报中指示:“要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努力整训工作,以求迅速地正规化……建立正规的供给制度,胶东银行可发行纸币,兑换成其他的纸币供给鲁南及其他地区之用。在取得政权后发行流通券及收粮、收税,以便有解决军队给养的长远计划。健全政治机关的工作……明确军队的组织原则,一切最重要的干部,应当由党员充当。

提高党支部及党员作用，支部……应当成为连队的坚强堡垒。”

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115师的电报中指示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强调“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并指示，对国民党军队要采取灵活政策，减少军事摩擦，努力从政治上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但对“阻碍抗日进步势力发展并向我攻击之反动势力与顽固派，我必须坚决反击之”。

山东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加上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很快打开局面，山东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迅速扩大。

在以后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和胜利反攻的岁月里，山东始终与华中南北呼应，相互支援，战略联系稳定，华中与华北及延安的通道畅通，充分发挥了“华中靠山”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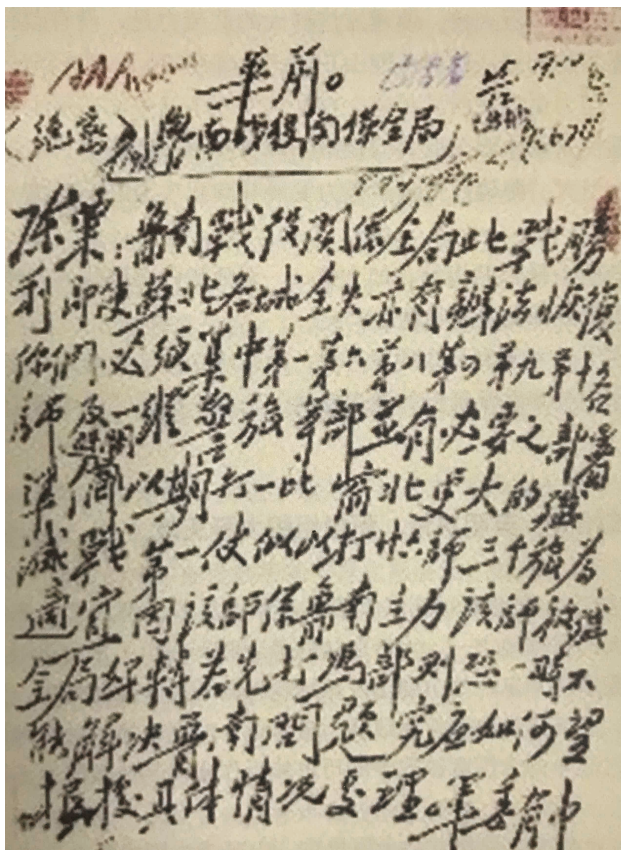
运筹帷幄，英明决策， 积极组织大歼灭战

抗日战争后期，山东抗日根据地通过连续攻势作战和大反攻，解放了山东绝大部分地区，成为敌后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以此为基础，山东成为我党我军进军东北的主要出发基地和粉碎国民党向北推进、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前沿阵地，同时成为决定今后敌我力量对比、时局转换的关键地区之一，从而为实现我党由抗日战争向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作出了其他根据地无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对解放区悍然发动全面进攻，山东成为国民党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主要地区之一。毛泽东也因此更加关注山东解放区的巩固和战局的发展。

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但是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到同年12月，歼灭国民党军34万余人，国民党军则以巨大的人员伤亡为代价占领了解放区的110余座城市。

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指示山东部队“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实施内线歼敌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山东军民在胶济线和鲁南地区连续取得反击敌人进攻的胜利，仅仅半年时间，华东军民就歼灭国民党军16.6万余人。这些胜利，鼓舞了山东军民的斗志，阻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速度。



毛泽东关于鲁南战役给陈毅、粟裕的电报

12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取得宿北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于18日辰时(7~9时)致电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在祝贺宿北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峯(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

1947年1月4日,我军取得鲁南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军会攻临沂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争取更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主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积极寻找战机,打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

鲁南战役后,华东主战场移向山东。国民党为彻底解除华东野战军(由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而成)对南京的威胁,同时,企图以军事胜利影响将要召开的涉及中国问题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遂于1947年1月下旬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妄图迫使华东野战军在临沂附近与之决战,进而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

对此,毛泽东、中央军委与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多次就作战方案进行电报沟通。毛泽东指示,宜在鲁南诱敌深入打歼灭战。

华东野战军首长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放手诱敌北进至临沂外围地区予以各个歼灭,同时做了保卫临沂的准备。

正当南线敌人迟迟不为我华东野战军引诱和调动之际,是“保卫”还是“放弃”临沂就面临最后的抉择。

密切关注鲁中南战场形势的毛泽东,在反复阅读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几天内频频发来的战情报告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为华东野战军最后决定作战方向奠定了有力的依据,

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2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挥师北上,中共中央华东局也主动撤出临沂。正当敌人占领临沂、为“临沂大捷”所陶醉时,华东野战军以优势兵力,将国民党军李仙洲部歼灭于莱芜,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南北会师侵占整个山东的计划,打乱了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部署,为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针对蒋介石继续把战火引向解放区的图谋,毛泽东、党中央又作出了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和在数量上超过敌军,就立刻转入全国性反攻的重大决策,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阳谷渡过黄河,展开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同时指示华东野战军迅速确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在外线积极歼敌,全力配合刘邓大军的外线作战。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抓住战机,积极实施外线出击,取得了沙土集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外线出击初期的被动局面,从而有力配合了刘邓和陈谢大军在中原的展开,积极策应了内线兵团在山东的作战。

1947年8月,国民党军为截断我军的国际交通线,迅速结束山东战事,以便移兵他用,蒋介石决定以胶东为作战目标,集中兵力,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就集中兵力于胶东内线作战与集中兵力在胶东外线作战两种方案的利弊报告毛泽东,请毛泽东电示。

当日,毛泽东即致电饶漱石、黎玉,并告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蒋介石似乎判断我主力

必守胶东，企图……吸引我主力进入内线后……加以封锁……蒋介石必在胶东方面力求速决，以便抽兵。因此，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以一部位于内线，以主力（二、七、九纵）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只要许、谭率三个纵队位于外线（诸城一带），寻机打一二个小胜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即不敢向胶东深入，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

毛泽东的电报一锤定音，此后又多次电示华东野战军和中共中央华东局，果断地决定要东线兵团应以一部位于胶东内线阻击，主力位于外线待机歼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保卫胶东解放区的作战方针得以确立。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英明指挥下，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和胶东解放区地方武装在历时5个月的胶东保卫战中，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节节抗击、杀伤进犯的国民党军，主力则避其锋芒，时分时合，创造战机，选择孤立冒进的敌人加以歼击，并结合围点打援，共歼灭国民党军6.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大大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开创中原解放区的作战。

从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我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对敌决战态势基本形成。基于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又将解决攻克大城市难题的战略意图转向山东济南，果断作出了攻打济南的重要决定。

为打好济南战役，毛泽东亲自审定作战方案，前后共发出近20封电报，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明确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攻济打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在参战部队纵队以上领导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作战原则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就在部队即将攻城时，即9月22日早晨，毛泽东又给华东野战军首长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去一封短电，要求布置多层堵击力量，防止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出逃。

事态的发展果然未出毛泽东所料，济南城被攻克后，王耀武从设在大明湖北岸地下室临时指挥部的暗道中化装潜逃。由于华东野战军和中共中央华东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事先部署民兵、公安干警和群众实行联防警戒，“节节堵击”，王耀武终在寿光被抓获。

济南战役从9月16日我军发起全线攻击，到24日攻克济南城，前后不到10天，而攻城作战仅用了2天。正应了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0天内夺取济南”的设想。

在指挥山东我军对敌作战的同时，毛泽东还对山东各项工作给予了许多指示。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山东党组织顺利完成了土改、生产、支前、救灾和各项建设任务，使山东解放区成为华东战场人力、物力、兵力的重要基地，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巩固后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由于毛泽东心系山东、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对山东战场的态势和发展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和智慧，才使山东战场的胜利为夺取全国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分别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干部、中共大丰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上海市雅力留学咨询公司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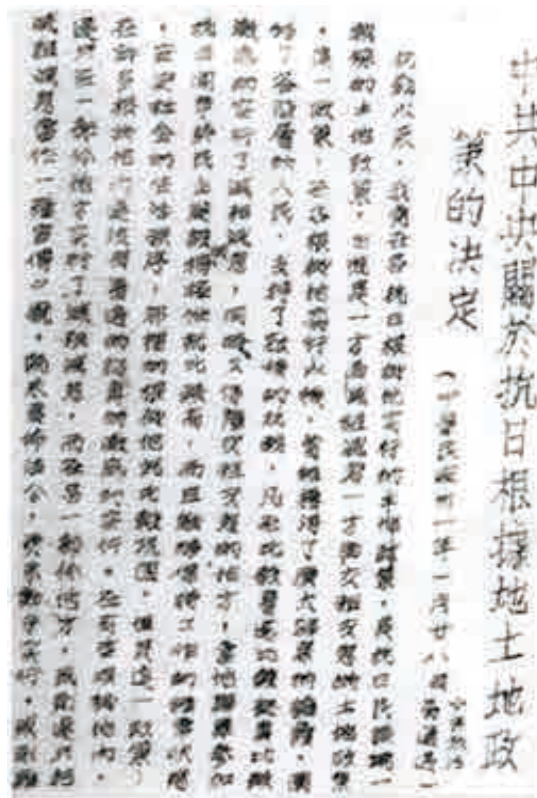
刘少奇与滨海区的减租减息运动

□ 王晓华

减租减息（简称“双减”），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广大农村实行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双减”政策的实施，为抗战时期团结各阶层人民，支持敌后抗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央的“双减”政策虽然提出比较早，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许多地方并没有很好地认真贯彻执行，效果也参差不齐。在山东，同样存在对战时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现象。尽管山东有些地区在1940和1941年实行过减租减息，但“收获不大”，“大部分地区未普遍切实执行，尤其未发动群众去做”。直到1942年春，刘少奇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期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才渐次开展起来。

刘少奇的群众观念比较强。在他刚进入山东境内，途经滨海区边缘小镇刘湾村时，他就到村中与老百姓交谈，了解减租减息情况。当他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后，他对随行的人员说：“这里是边沿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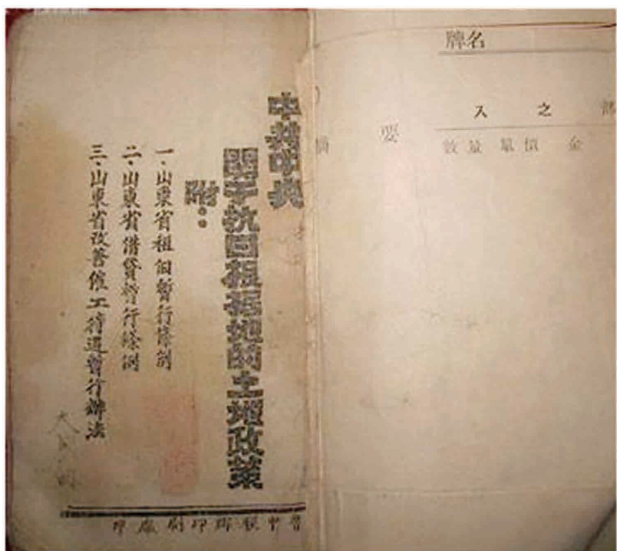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看来这里的减租减息运动可能还没有真正搞起来，而农民群众都有着强烈要求，可见我们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是完全符合群众要求的。”

到达西朱范（旧城朱樊）后，刘少奇又带着这个问题多次进村入户，了解真实情况。通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刘少奇认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山东党的领导干部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由于根据地没有发挥基本群众的优势，致使党的基层组织、政权建设及抗日的群众组织，都极不稳固。

4月16日至18日，在西朱范村召开的山东分局委员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专门就减租减息问题向与会人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阐述。刘少奇指出：“我们发动群众抗日，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是什么？是主要通过青运、妇运带动整个运动呢，还是通过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我看，就是要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作为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道理很明显，把农民发动起来了，他们的老婆孩子也就跟着起来了。”

在4月25日召开的山东扩大的干部会议上，刘少奇作《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刘少奇又进一步严肃地指出：“减租减息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位置上，而是放在第四位。”“山东根据地日渐缩小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他还对山东分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你们为什么可以作国际形势报告、自由婚姻的报告，而不去作减租减息的报告呢？中心问题是没有群众观念，没有关心群众疾苦，你不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谁会来参加你那个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最后强调：“当前山东的工作，就是要以农民运动为中心，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



山东省战工会颁布的“双减”条例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和两个补充指示。《决定》中提出：“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与组织基本群众，纠正过去的错误，克服脱离群众与孤立的危险，分局特郑重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并确定自麦收至年底这段时期，“山东全党的领导及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今后必须围绕着并贯彻的完成这一中心任务”。

同时，为保障减租减息有法可依，在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山东省战工会）主任委员黎玉的主持下，相继制定颁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和《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三个文件，自5月15日起在全省范围内施行。为切实加强山东群众运动的领导工作，山东分局还成立了群委会，黎玉任书记。

1942年5月，全省“双减”工作会议在山东鲁中区沂南县薄板台村召开。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省战工会主任委员黎玉代表山东分局就如何开展减租减息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会议确定以滨海区莒南、临沭两县为“双减”实验中心县。

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再普遍展开，全面开花，是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和建议实施的。刘少奇在4月底所作《群众运动问题》报告中，就指出：“群众运动以农民运动为中心，在这里就是要落实到以减租减息和改善雇工待遇为重点的工作上来。打一个比方，滨海区有十几个县，我们进行工作时就可以一个县或两个县为中心作为基础。在这一两个县中再以一个两个区为中心，在区中再以一两个村为中心。抓住中心，做好中心工作，就能突破中心而扩展到全面。工作中切忌平均用力。我们设想要派200个干部去工作的话，那么应把150个左右放到中心的一两个县，其他50个左右相应分到另外各县。依次类推，到了县的时候，再以干部人数的大多数放在中心区，其余分到其他各区，而在区中以7—8个干部集中到中心村进行工作，这就是‘中心突破’的方法。再具体点，当这些人进到哪一村的时候，要首先以一个人和保长配合，与地主士绅进行统战和宣传，解释减租减息不妨碍他们的利益，并绝对强调和保证交租交息。或者开一开座谈会，公开说明可能发生的流言谣语以及汉奸托匪的欺骗宣传，牵开他们，麻痹他们，其他几个则可以借机去做佃户、贫农、雇工的工作。”

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和会议精神，山东分局在确定滨海区的莒南、临沭两县作为实验中心县后，从分局党政各机关、山东纵队、抗大一分校抽调200名干部，组成两个大型工作团，在2个中心县、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个外围村全面展开。

在减租减息初期，部分地区的个别同志有故意或无意绕开农救会，包办开展这项工作的做法，一度出现无农民参加运动，工作无法施展的情况。个别地区由于对党的减租减息方针政策理解不透彻，出现没收地主土地、均分给农民，甚至把略有财产的小富农也列入减租对象，行为过“左”的现象，引起了这些人的强烈不满。也有部分地区的农民因惧怕地主报复，不敢出来斗争的情形。这些情况反

映到刘少奇这里，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他找来朱瑞，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刘少奇说：“任何事物的运动总是沿曲线方向进行的，这是规律，不足为奇，群众起来后，过‘左’一点，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我们当领导的这时尤其要注重掌握准方针政策，把握住运动的火候。既要稳住局势，又不容许挫伤群众的斗志，不容许向群众泼冷水，泼冷水是罪过。唯有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地开展下去，轰轰烈烈地进行起来，才能把运动搞得又深又透。”

他针对在减租减息运动过程中，部分领导干部不重视农救会地位，忽视群众团体作用，以高高在上态度代为包办的工作作风，刘少奇也提出批评：“群众团体本身的任务，是以保护群众利益为中心的，在不违背统一战线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群众团体要真正代表农民出来说话，也就是说一切群众工作都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领导，但这并不是说群众团体就不接受党的领导了，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领导原则和领导方法问题，那就是党要在政治上去掌握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不能去包办或干涉他们的内部生活。我们党是通过党员接近和影响群众的，每个共产党员都是以群众的面目出现的，在这里也就是以一个普通农会会员的资格出现的，要严防官办代替，否则，其后果只能使群众团体变质。”

刘少奇不仅在工作方法、工作原则等方面给予指导，而且亲历亲为、身体力行到各地了解真实情况。他把从华中带来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也分别派下去参加“双减”。他本人就多次深入到西朱范村、夏庄、东盘、大树等村实地调研。

1942年6月17日，随同山东分局、115师师部一起行动，正在东盘村开展工作的刘少奇他们得知日军即将“扫荡”临沭一带的情报后，为安全起见，在部队的掩护下，连夜向赣榆境内转移。半夜时分，他们一行来到赣榆县黑林镇大树村。

第二天，当刘少奇了解到大树村的“双减”运

动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工作团几次发动群众都没有成功时，表情变得异常严肃起来。经与山东分局、115师领导研究，决定从“点”抓起，以此带动全村及周边村“双减”工作的开展。

在大树村一处简陋的茅屋里，刘少奇找来住在这个村的滨海区“双减”工作团团长孙汉卿、贫雇农代表熊方文谈话。刘少奇以他1922年10月自己如何发动安源路矿大罢工为例，循循善诱地启发、引导他们怎样来开展这场正义的斗争。谈话中，刘少奇顺手拿起一把筷子，比划着说：“团结起来就是力量。你们看，一根筷子我们很容易把它折断，要是一把筷子我们就很难把它们折断了！”

放下筷子，刘少奇又伸出一只手展示在他们面前，反问：“你们说，打人是伸开巴掌打有力呢，还是握紧拳头打有力？”

在得到孙汉卿他们肯定的回答后，刘少奇高兴地说：“对的，咱们贫雇农只要团结起来，抱成团，就一定能斗倒地主，‘双减’就能最后成功！”

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孙汉卿他们迅速展开工作，很快建立起了一支由贫雇农组成的农民组织“大树

村农民职工救国会”。在熊方文的带领下，他们商定在端午节后的第二天晚上，专门斗争大地主熊丙坤。由于消息泄密，熊丙坤提前做好了准备，他网罗28名地痞流氓，肩扛木棍，埋伏在自家门前，打算给熊方文他们一个下马威。

职救会发现这一新情况后，立即组织了70多名长工，扛着扁担、铁锹等家什，于当天晚上，高呼着“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坚决斗倒熊老七”等口号，浩浩荡荡扑进熊丙坤家。熊丙坤见势不妙，忙紧闭大门，企图顽抗。一个叫宋广田的雇工当场砸断了几个窗棂，震慑住了熊丙坤。最终，熊丙坤不得不与职工会谈判，答应了职救会提出的条件。第二天就与职救会签订了减租减息合同，规定雇工每人每年增加工资粮450公斤、布1.2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大树村“双减”热潮的带动下，赣榆各村的“双减”运动轰轰烈烈地得以顺利展开。

在刘少奇的亲自领导和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仅1942年一年间，山东抗日根据地（不包括鲁南和冀鲁边）共计减租18294户，减租地393482.7亩，减



山东群众减租减息大游行

租粮 6207283 斤；减息 1512 户，减息粮 25348 斤，减息款 111034.8 元；增加工资人数 40406 人，增加粮食工资 8192960 斤，增加款资 23016 元。“双减”运动的开展，也极大调动了群众抗战热情。到 1942 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仅民兵就已发展到近 22 万人，自卫团成员 81 万人。

刘少奇在山东滨海根据地发动的这场“双减”运动，影响力是持久的、深远的。“双减”运动自 1942 年夏开始之后，一直持续到 1945 年底才基本结束，历时三年半之久。从 1944 年下半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山东“双减”运动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山东各根据地共召开斗争大会 1.9 万余次，斗争恶霸地主 1.3 万余人，清算各种土地、粮食等总计价款 3 亿元（北海币）以上；进行减租减息的村庄达 1.47 万个，占当时根据地村庄的 63%；有 404

万农民参加了各类群众组织，占当时根据地人口的 26.5%，数以万计的贫困农民改善了生活条件。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是在刘少奇的亲自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的。它有力地发展、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对根据地渡过困难时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开国上将肖华曾回忆说：“在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根据地的每座村庄就变成了坚强的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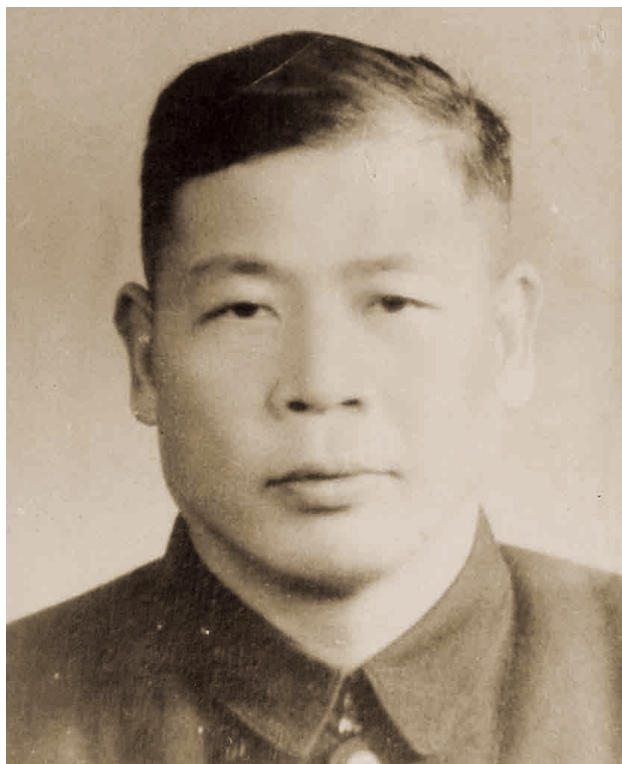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东海县商务局）



反映滨海区莒南县大店镇农民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向地主展开说理斗争的版画

海属革命的先驱——惠浴宇

□ 成 文



惠浴宇

惠浴宇同志生于1909年7月，原名惠美琬，我市灌南县新安镇人。自幼脾气犟直，勇敢刚毅。在大哥惠美珊的支持下，到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设在板浦镇）读书。在校期间，他爱看进步书籍，并带头参加学校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1923年，考入东海县省立第十一中学（与第八师范均为海州师范学校前身），在董淮、杨光奎等教师的教育下，坚定了自己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决心。

1927年，惠浴宇满怀着“铲尽天下不平事”的愿望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弃学从军。后又返回学校读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

1928年5月，日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惠浴宇立即以学生会的名义，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声讨日本当局，宣布罢课一个月，并组织学生宣传队奔赴城乡演讲，宣传“御外侮、申民愤、保国权”等。

7月，经过万金培等人的介绍，他和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彭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

中共江苏省委从上海派李超时和小叶来海州和惠浴宇一起商量建立党组织，他们在海州白虎山上的一块翘石下席地而坐，召开了建立中国东海特别支部会议。李超时任特支书记，小叶任组织干事，惠浴宇任宣传干事。从此，海州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揭开了海属地区革命历史的新篇章。惠浴宇利用自己学生身份和学生会主席的社会基础，首先在东海中学的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先后吸取了22名同学入党，并建立了海州地区党的第一个基层支部——中共东海支部。惠浴宇兼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东海中学成为海属四县的革命摇篮，该校学生党员分赴各县，像颗颗火种撒向社会，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制造借口，辞去了董淮校长和一批进步的教师，派来了封建顽固的谷延隽等人来学校，他们来势汹汹，制定了一条条校规，派人监视、查访、限制学生的活动，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

1929年5月21日上午，全校师生又集中在一起，进行一周一次的纪念活动，在读完《总理遗嘱》后，训育主任陆秋斋爬上讲台，训斥学生冯硕仁，指天骂地，神气活现。礼堂里沸腾起来，学生有的喊：“校方侮辱人格！”有的喊：“抗议！我们抗议！”把陆秋斋气得浑身发抖，这时，惠浴宇大喊一声：“打！”话音未落，学生揪住陆秋斋的头发，挥拳就打，校长谷延隽挤到台前，被学生端起痰盂劈头盖脸扣了下去，谷延隽满头污水淋漓。愤怒的学生像火山爆发。这就是海属革命历史上有名的“拳打陆秋斋，水淹谷延隽”。这帮反动教师吓得连夜逃出了学校。学生接管了学校的大权，为了防止警察局来抓人，学校组织了童子军，手持童子军棍昼夜巡逻。

在大闹东海中学的同时，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组织领导了云台山大村“扁担会”暴动。1929年初夏的一天，上山砍柴的农民和山霸发生冲突，“扁担会”会员，挥舞红旗，肩扛扁担，手持铁斧、大

刀，蜂拥上山，山霸的看山队闻风而逃，“扁担会”占领了云台山。山霸对此不肯罢休，请国民党灌云县常备队来镇压，“扁担会”早有准备，打得灌云县常备队落荒而逃，东海县行动委员会在“扁担会”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武装团，迅速发展到了1000多人。

后来，由于敌众我寡，暴动失败了。国民党出动了大批的军警和县卫队，包围了东海中学，对东海中学进行大搜捕，开始了疯狂镇压和血腥屠杀，四处通缉、捉拿共产党员，这就是海州革命史上的“六一大逮捕”。惠浴宇也是通缉名单中的一员，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匆忙中离开了海州。

1929年11月，惠浴宇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并出席了中共江苏省第二次党代会。在会上，他聆听了周恩来、李立三、陈云等人的报告。1930年4月，他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7年，坚贞不屈、坚持斗争。1937年2月终于顽强地活着走出了国民党的监狱，他随即便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不久，惠浴宇作为党向新四军派遣的干部被派往江苏，先后在苏中、苏北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历任中共苏中工委书记，江（都）高（邮）中心县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等职。为了我军能够北渡长江在苏北扎下根来，惠浴宇曾随陈毅三进泰州城，对国民党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开展统战工作，为建立、巩固和壮大苏中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惠浴宇先后担任苏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46年重庆谈判后，国民党撕毁协议，向我根据地姜堰一带侵犯，惠浴宇作为我军首席代表，深入虎穴与敌人“火线谈判”，迫使敌人在谈判桌上签字。我军全面转入全国战略性反攻后，惠浴宇任解放军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率兵驰骋大江南北，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惠浴宇出任第一任苏州市委书

记、市长兼军管委员会主任。后任苏北行政公署主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1958年为建设南京长江大桥，惠浴宇挂帅担任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造反派武装关押，但他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坚持真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78年惠浴宇恢复工作，他重新担任江苏省省长，立即以全部的精力投入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上来。如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程千帆教授，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只能赋闲在家成为街道居民，领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就是由惠浴宇写信给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请他出面干预，圆满解决了程千帆先生的平反问题。程千帆才得以在南京大学著书立说，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面旗帜。

1983年惠浴宇主动退居二线，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惠浴宇与自己的母校海州师范学校（现连云港师专）感情很深，1986年10月，海州师范建校七十周年，他担任校庆筹委会主任，专门创作《海州岁月》一书，并为母校题词“四个现代化，一代胜似一代”，祝愿海州师范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人。

1989年7月8日，惠浴宇同志突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终年80岁。

（作者单位：中共连云港市委研究室）



1986年，海州师范学校领导等拜访惠浴宇（后排左起：李乐琳、宋健明、魏光宗，前排左起：冯若愚、周恒晋、惠浴宇、邰华民）



张兆祥

一位灌河老战士的足迹

□ 张 沂

重庆市大渡口区一幢居民楼，87岁的张兆祥老人、老伴孙春莲和家人就生活在这里。他们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回家乡了，但是他们一直通过书信、报纸、电视等媒介，密切关注着家乡面貌的变化，每当谈到家乡灌南，他们的关切和思念之情不由得溢于言表……

1930年8月10日，张兆祥出生在连云港墟沟，不久，因为战乱随父母回到家乡灌南县张店镇宋圩村（原属灌云县）。家里很少的一点土地，微薄的收成，吃不饱，穿不暖，童年在饥饿和贫寒中度过。

1939年3月，日军的铁蹄踏上了灌河两岸，灌河上空，乌云翻滚；盐河两岸，烽烟四起。日军、伪军、土匪、自然灾害，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无数人民惨遭兵火蹂躏，流离失所。张兆祥一家人的生活也

陷入了困顿，生计变得更加艰难。为了生存，他先后辗转在王马庄、腰庄、陈庄等地，到地主家割草放牛，干农活，过起了披星戴月、起早摸黑的雇工生活，细小的手掌上磨起了老茧，稚嫩的双肩添上了压痕。十一二岁的张兆祥不得不和父亲一起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英勇的中国人民坚决不当亡国奴！灌河人民在日军的侵略下没有屈服，灌河两岸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汤沟、大前庄、上马台……到处燃起了战斗的烽火。共产党员吴书、孙良浩、孙存楼、孙秉惠、封必琉等人在家乡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武装，勇敢地走在抗日第一线。看到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战斗身影，在灌河边割草放牛的张兆祥也深受鼓舞。每当看到日伪军的凶残暴行，他不由得攥

紧了镰刀；每当看到抗日战士与敌人机智周旋，也不由得为他们捏上一把汗。他有时候把观察到的敌情主动向抗日武装报告，担任了义务侦察员的角色，同时，他也多次向地方领导封必疏表达了要放下镰刀去打仗的决心。1944年7月，十四岁的张兆祥志愿报名参军，光荣地成为灌云县新安队的一名抗日战士。他在区领导的带领下勇敢地战斗，给各乡送文件和通知，和战友们一起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他心中充满了对和平的希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工作积极，踏实肯干，受到了区领导的一致好评。战斗的洗礼和工作的磨炼，使他不断成熟起来，也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同年11月，他被选送到灌云县中队当战士。

县中队的任务是保卫政府机关安全，站岗放哨，巡逻，到边区剿匪，保护人民利益，帮助当地群众播种收割，保卫麦收等。当时的县中队有3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10人左右。在县中队，他和战友们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凭着430万军队，要打内战，要向解放区进攻。在内战形势越来越紧急的情况下，上级领导要求要加强战备，1946年秋季张兆祥和部分战友被抽调到华中军区六分区（原淮海军分区，后为苏北军区第六军分区）1支队1营2连当战士。

支队，相当于团，另外还有2支队和3支队。原来的淮海主力部队出师东北以后，淮海军分区于1945年10月重新组建新10旅，这三个支队是在1946年9月以新10旅第4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又称华中六分区独立旅、淮海独立旅。这三个支队和地方主力新10旅立足根据地，依靠群众支持，一起战斗在苏北战场上。

张兆祥参军后，勤学好问，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认字，进步很快。1947年春季他由淮海独立旅1团2连战士调到1团1营营部通讯排任通讯员，通讯员的任务是从支队领文件，向各连送通知，行

军作战时紧跟和掩护领导，必要时还要到前线参加战斗。

由于表现突出，作战勇敢，张兆祥于1948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兆祥和战友们在一支队接受了更加严格的政治教育和系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有形势政策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革命纪律教育、群众纪律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等。

军事训练有队列训练、技术训练、战术训练，行军等。一支队扎根苏北根据地，顽强地坚持对敌斗争，张兆祥先后参加过阴平、丁集、高流战斗、泗阳和宝应战斗、泗阳遭遇战、追击战等。

1947年12月，第六军分区3个支队，在泗沭地方武装配合下，于泗沭县王集迎头痛击由戚渡、史集过六塘河清剿的国民党部队；1948年2月，第六军分区三个支队改为直属1、2、3团，担任机动作战任务，1948年5月，第六军分区1团（原1支队）在沭阳城东北郝庄一带粉碎了敌人合击六分区地方武装及党政机关的企图；1948年6月20—21日，为配合苏北兵团35旅陇海铁路东段攻势，第六军分区以1、2两团和潼阳独立团攻打沭新线高流据点，高流守敌放弃据点逃窜，据点被我所摧毁；1948年11月，第六军分区1、2、3团和灌云、宿迁两独立团参加淮海战役，解放了板浦、南城、墟沟、连云港；1948年12月，六分区1、2、3团南下两淮，追击敌人，在板闸、河下一线，与敌人激战，保卫了收复的淮阴城，然后沿大运河向南进军。1948年12月16日，在收复宝应、汜水之后，六分区独立旅（淮海独立旅）奉命上升为华东野战军12纵队34旅，旅长吴大林，政委雷铁鸣，该旅即日离开六分区，所属1、2、3团改为100、101、102团，从此他们和华野12纵35旅、36旅中的淮海子弟兵们一起离开了家乡，踏上了新的征途。

1949年元月，华东野战军12纵队改编为30军，34旅改为88师，其中100、101、102团分别改为

262、263、264 团。

1949 年元月初，张兆祥从 30 军 88 师 262 团一营通讯排调到 264 团警卫班，由通讯员改为警卫员，排级待遇。

1949 年 4 月，张兆祥与 30 军的战友们参加了渡江战役，部队在安徽当涂、芜湖正面登陆后，又参加对国民党军南逃的 5 个多军的歼灭战。

1949 年 5 月，30 军参加解放上海战役，解放浦东之奉贤、南汇、川沙、于白龙港歼国民党第 51 军 8000 多人，又协助兄弟部队攻克高桥，切断国民党东逃之路。上海解放后，张兆祥和战友们一起担任淞沪警备任务，成为一名光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1949 年秋，张兆祥被选送到 30 军 88 师教导队接受培训。

1950 年 1 月，88 师改隶志愿军 9 兵团 26 军，1950 年 11 月，参加抗美援朝。

在 88 师教导队，学员们学政治、形势，重点是朝鲜形势，而后部队从上海移防山东滕县、东北辽宁抚顺、吉林临江，进入朝鲜后，88 师教导队撤散，张兆祥被分配到 88 师 264 团通讯排担任通讯排长。

部队移防山东时，张兆祥有一次跟随团参谋长外出执行任务，在拥挤的集市上，一名土匪想借人多的机会偷参谋长的枪，土匪刚把盒枪拿到手还没有来得及开溜，一双铁钳子一样的大手从天而降，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腕，眼明手快的张兆祥一举把土匪擒获。年轻的张兆祥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革命纪律性，时刻准备为党、为革命而投入战斗。

志愿军 9 兵团部队入朝，在东线长津湖一带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形势非常艰苦，穿的是在国内上海亚热带地区配发的一斤棉花的棉衣，在朝鲜寒带地区零下 40 摄氏度气候下，冷得吃不消，朝鲜老百姓的房子被美机轰炸焚烧所剩无几，我们部队住的是雪山挖的洞，吃的是自己携带的干粮，很少有兵站补充，一两天吃不到一粒粮是常事。每晚行军

路程都在 50 ~ 60 公里以上，打的是美军的飞机、坦克加大炮。在战场上敌人的飞机坦克铺天盖地，完全是现代化作战。我们志愿军是“小米加步枪”，条件非常艰苦。东线作战，志愿军 9 兵团指战员因严寒和饥饿导致减员很多。在东线战场，88 师的淮海子弟兵们作战英勇，不怕牺牲，经受了严峻考验，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二次战役结束后，部队转入咸兴地区修整。1951 年 2 月，88 师撤编。1951 年 6 月，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后，原 264 团领导上调分配，团部机关人员和 26 军 77 师合并，264 团通讯排与 77 师通讯排合并，原 77 师通讯排排长任排长，原 264 团通讯排长张兆祥任副排长。在通讯排，他常常要冒着炮火把指令送到前线指战员的手上，有时还要到前线了解敌情。有一次他到驻有敌人的一个院子里执行侦察任务，随行的一位战士在外边接应。任务完成刚要回撤时，被敌人发现了，在这危急关头，张兆祥几个箭步跃上围墙，敌人在墙里拉他的脚，战士在墙外拉他的手，万幸的是，他被战士拉到了墙外，顺利归队。

没有多久，1951 年的秋季，张兆祥又从 77 师通讯排调到 77 师 230 团 2 营 4 连任副排长，他与战友们坚守五圣山前的 454.4 高地有 4 ~ 5 个月，454.4 高地对面就是美军占领的半个鸡雄山，与他们排阵地相隔的距离只有 100 多米。刚调到战斗排，张兆祥就冲锋在前，带领战士们勇敢接敌，一次打死 7 个敌人，一次打死 9 个敌人，让战士们对原来的师通讯排副排长刮目相看！

在朝鲜战场上，张兆祥和战友们一起从长津湖到汉江边，从三八线到平（康）金（化）前线，先后参加了第二、第四、第五次战役和五圣山阻击战，阻击美陆战 1 师、美 2 师、美 25 师和伪 9 师北进。他和战友们发扬我军勇敢的拼刺刀精神，不怕牺牲，打出了淮海子弟兵的威风，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风，受到了军首长、兵团首长的高度赞扬。

正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在政治上大大提高了中

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在经济上保障了国家恢复建设，在军事上也打出了国威军威！

1952年6月，26军从朝鲜回国。

1952年秋，张兆祥调到坦克团任排长，不久又调到230团2营炮兵连、五连、四连任排长；1953年秋至1954年秋，到26军77师教导队学习文化。

1954年秋至1955年春，张兆祥在26军77师230团3营8连任排长，担负刘伯承元帅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的保卫工作。

年轻的张兆祥看到军事学院里的将军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教室学习文化知识，心里也升起了学习文化的渴望。他小时候是一个穷孩子，没有进入正规学堂读过书，参加革命初期，基本上就是一个文盲小战士，随时都有为革命牺牲自己的准备，走到哪里打到哪里都不知道。后来在作战之余，挤时间零星地学习一点文化，在教导队也系统地学习了一些文化，但是在工作中，他时时感觉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不久，他的愿望就得到了满足！

1955年春至1955年秋，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学校先驻安徽安庆市，后移防安徽合肥市。

1955年秋季，组织上调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碚步兵学校学习军事，为学校3营10连学员，在校有政治学习、射击训练、识图用图学习、战术学习、战术勤务学习等。

以上政治、军事技术、战术学习共26项，他有24项课得到90分以上成绩，只有两项得80多分，1956年冬季毕业时他被北碚步兵学校定为上等生学员，只有26项课程全是90分以上，才能定为优等生学员。

1956年冬，他被分配到13军37师110团2营4连任副连长，1959年秋至1964年春任连长；1964年至1966年秋任13军37师110团2营副营长；1966年秋至1969年夏任13军37师110团2营营长。

13军当时驻防云南省，担任镇守边陲的任务，

刚从军校毕业的张兆祥精神焕发，信心百倍，立即投入到火热的军事训练和战斗任务中。他把所学到的知识和实战经验，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关心爱护士兵，手把手传帮带。110团是红军师奇功团，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陈赓大将麾下的四大主力团之一，2营4连是英雄的模范连队，张兆祥忘我工作，带领连队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和荣誉，受到了战士们的拥戴和首长们的赞扬！1968年13军移防重庆。1969年夏至1969年冬他任13军37师110团参谋长；1969年冬，他被任命为13军37师110团副团长、团党常委。1972年，由于多年的战斗生涯和艰苦的工作环境，张兆祥患上了心脏病，但是他始终牢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不叫一声苦，不说一声累，把病历和药瓶往兜里一揣，立刻又走上了练兵场，他多次承担军、师交给的战备训练和教学任务，每次都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

1979年2月至3月，年届五旬的他主动请缨，参加云南方向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身先士卒，随110团先头部队2营一起行动，在战场上，他有一个绝活，只要听到炮声，就能判断出是什么炮，炮的方位，距离多远，落点在哪里，是否安全。丰富的战斗经验，果断的指挥调度，大无畏的勇敢气魄，他赢得了战士们的尊敬和信任，成为战士们心中的主心骨和守护神。他参与指挥攻打205、221、218、264、332高地，他带领战士们攻果沙，战柑塘，20多天的战斗，他昏迷了七次，瘦了11斤，战场上无情的炮声，也再一次损伤了他的听力。

回国后，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多次打报告要求到地方工作，1982年春组织上同意他转业，调到重庆钢铁厂任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从此他离开了战斗了38年的军营，他在13军37师110团工作期间，甘为人梯，甘当伯乐，讲风格，讲奉献，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不计得失，淡泊名利。他带过的兵，有的同志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还有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如战斗英雄刘戈平、被中央军委授

予“勇猛顽强英雄连”称号的110团1营第2连等)。

转业时，张兆祥为行政十五级，到地方工作以后，又参加了两次行政级别调整，行政级别为十三级。1990年8月张兆祥离休，离休后根据党和国家政策规定，享受副厅地级政治生活待遇；2015年第二次提高待遇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

张兆祥老同志获得的荣誉和表彰主要有：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入朝慰问团慰问章、中央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念章、云南省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念章、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章，对越自卫反击战三等功奖章。

在家庭教育方面，他严格要求，毫不放松，教育后代要听党话，跟党走。目前，张兆祥的家庭有七名共产党员：张兆祥、老伴孙春莲、大女儿张苏昆、大儿子张苏华、大孙子张纹豪（重庆新桥医院外联部主任）、大孙媳妇武晓岚（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尉军官）、小孙子张卜允。

回忆起从当年淮海大地灌河两岸走出的许许多多老领导、老战友，如老政委吴书、老红军吴大林（四川人）、老领导孙良浩、封必疏、邱永生……儿时的伙伴吴述之（灌南县张店镇宋圩村人、30军88师262团战士，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牺牲）、褚长发（灌南县张店镇宋圩村人、志愿军29军某部连长，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封其雨（灌南县张店镇宋圩村人、华野十二纵某部战士，淮海战役时牺牲），张兆祥老人感慨万千：他们为革命流血、牺牲，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是自己



2016年春，张兆祥（左一）回老部队军营作客

学习的榜样！他们的精神感召和无私帮助，永远是自己前进的动力！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兴县视察说：“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成千上万个像张兆祥老人这样立场坚定的淮海老战士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义无反顾地踏上战斗征途，奋战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各行各业，他们在革命的每一阶段，都时刻不忘初心，甘愿做一颗普通通的螺丝钉，他们永远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

夕阳正红，桑榆未晚，如今离休后的张兆祥老人，和老伴孙春莲居住在重庆，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他虽然离休了，但是仍然保持军人本色、党员本色，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新长征”的路上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灌南县初级中学）

寻找“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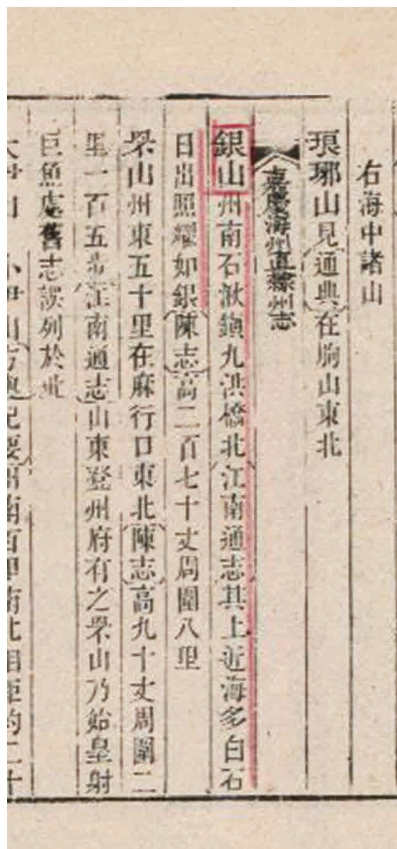
□ 韩世泳

银山“消失”有蹊跷

为什么要寻找“银山”？

因为，在历史上“银山”曾经是海州的一座名山。明代《隆庆海州志》《万历淮安府志》及清代《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都有关于“银山”“银山坝”的记载。特别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不仅在其“卷第十一·山川一”中有“银山：州南石湫镇九洪桥北”的记述，在“山川二蔷薇河”条目中也有“州南二十里有银山，山下为银山坝”的记述。而且，在“卷第二十一·传第一”中记述抗金英雄魏胜事迹时，也记载了魏胜、李宝陆军、海军配合共同抗金时，还在此屯兵，抗击来犯金兵的史实。这些资料说明，银山不仅是古海州城南一座普通的山，还是祖国东海（今黄海）边的军事要地。

可是，近几十年来，“银山”这个山名，在港城大地上“消失”了。我市出版的地情资料书《江



图为清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关于银山的记述

苏省连云港市地名录（城区部份）》《连云港群山概览》《云台山资源大观》，以及《海州区志》《连云港市志》《连云港市海州区志》（1986~2005）等地方志书中，均不再有“银山”这个山名了。

好好一座在港城发展史中有着光辉一页的山，好好一座历代州志都有记述、沿用了上千年的山名，近几十年间突然“消失”，再不听人讲、再不见记述了，岂不蹊跷？

厘清寻找“银山”思路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呢？笔者曾作过一些探索。明代《万历淮安府志》中说：“银山，在石湫镇九洪桥北。其山近海，多白石，日出照耀如银。”此志说：“石湫镇，去治南二十里。”“新坝镇，去治南四十里。”按此说法，这座“银山”的大致方位，应在今海州区锦屏山南的锦屏镇与新坝镇之间。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笔者经常在这一带采访，从锦屏公社（今锦屏镇。下同）的李圩大队（今锦屏镇李圩村）到新坝公社（今新坝镇。下同）驻地新坝，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不要说山，就连高土岭都没有。查阅新出版的志书等也都没有“银山”的介绍。笔者请教参与编写地情资料的有关同志，也没得到明确答案。《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记述“银山”时写道：“《陈志》：高二百七十丈，周围八里。”说明此山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山包，就是开山采石，也不可能打得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最近，笔者又向参与编修《锦屏镇志》的李金禹等同志请教。李金禹是土生土长的锦屏镇李圩村人，今年73岁，退休前又任过锦屏镇党政办主任，可谓“锦屏通”。当我问他“锦屏镇有没有过叫‘银山’的山”时，他随口应答：“有啊！”并且，很干脆地说：“就是刘志洲山啊！”但当我进一步问：“‘银山’怎么变成‘刘志洲山’

的呢？”他说：“庄上人都这么叫。当地人传说，古时有个叫刘志洲的人带兵住在这山上，除暴安良，造福乡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座山叫‘刘志洲山’了。”锦屏镇志办的李金作还介绍了当地流传甚广、发生在这山上的有关刘志洲和“智斗金鸡怪”的传说。

他们的回答虽没能让我得到要找的答案，但却使我悟出了“寻找‘银山’”的思路：今天的“刘志洲山”，是否就是古代的“银山”？

多方比对找答案：今“刘志洲山”即古“银山”

于是，围绕这个想法，对古今资料书中有关这两座山的记述，作一番全面、细致的认识、分析、比对，力求从中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没想到，这一比对，问题的答案就一步一步地清晰了。

比对山体看差异。在熟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新老资料书中关于海州锦屏山系独立山体的记述进行比对。通过比对发现相同之处是，新老地方志等地情资料书，在记述锦屏山系的独立山体时，都记有锦屏山、孔望山、胸山头、石棚山、白虎山、蜘蛛山等。不同之处是，新的地方志和地情书籍中，比老的志书少了座“银山”，多记了“刘志洲山”和“磨盘山”两座独立山体。

《连云港群山概览》载：“磨盘山：在孔望山西一公里，因山头岩石重叠若磨盘状故名。”而孔望山在锦屏山北，磨盘山在它西一公里，自然也在锦屏山之北，与古州志所载“在州南二十里”的石湫镇九洪桥北的银山，毫不相干。因此，新老资料书对于锦屏山南麓独立山体记述的差异就是：多了一座刘志洲山，少了一座银山。

比对记述看区位。通过比对，笔者发现新老志书等对“银山”和“刘志洲山”的位置的记述极为相似。

老志书对“银山”的记述：

《隆庆海州志》说：“在石湫镇九洪桥北。”

《万历淮安府志》说：“银山，在石湫镇九洪桥北。其山近海……。”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说：“州南二十里有银山。”

新中国成立后新修的地方志及有关地情书对“刘志洲山”的记述：

《连云港群山概览》说：“该山位于锦屏山南侧，锦屏镇驻地正东 1 公里处。”“这里亦是南宋将领李宝水师抗金的战场之一。”（《连云港群山概览》第 106 页）

《连云港市志》说，此山体“由岗嘴峰、平顶山、刘志洲山、哑巴山 4 座山头组成。主峰刘洲山海拔 105.9 米。东侧在元代以前是海州古海港的主要港区，亦是南宋将领李宝水师抗金主战场之一。”（《连云港市志》上册第 10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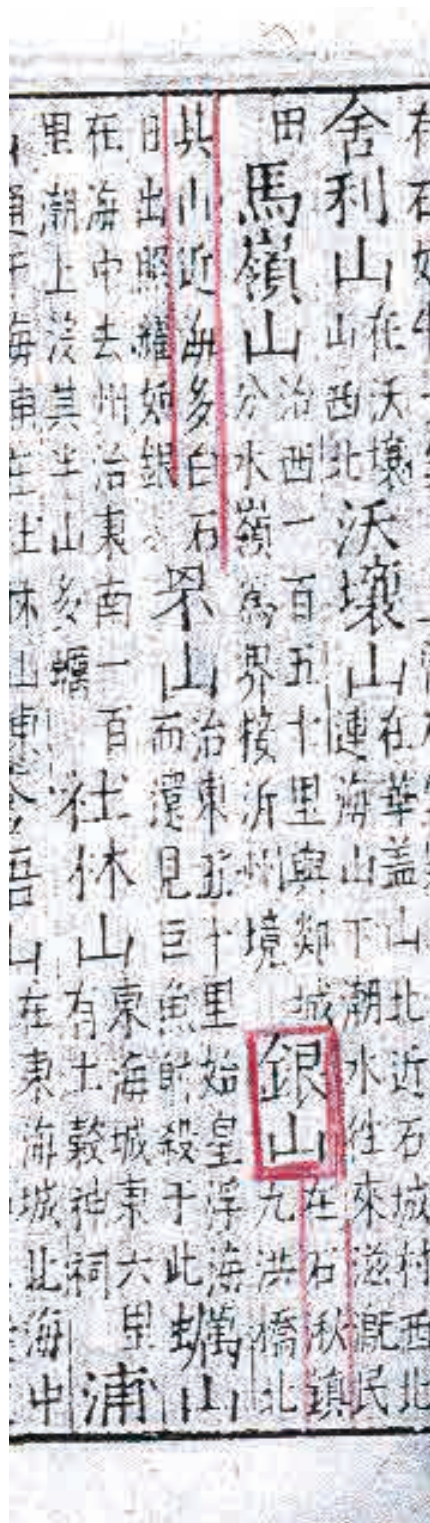
比对以上记述，不难看出，新老志书等对于“银山”和“刘志洲山”区位的记述，尽管记述文字不尽相同，但所记的两座名字不同的山体，都在锦屏山南，所在方位极为相似；和海州城的距离也大体相当。

比对山石看山名。新老资料书关于山体得名原因的记述有所不同。

《万历淮安府志》记述“银山”时写道：“其山近海，多白石，日出照耀如银。”也就是说，此山是因为山上多白色的石头，太阳一照，就像银子似的闪闪发亮而得名。

《连云港群山概览》等书籍介绍“刘志洲山”时，多说“刘志洲山：因人得名，其史无考。”说当地民间传说，古代有个叫刘志洲的人占此山为王，在山顶盖有金龙殿。刘志洲在此除暴安良，多行善事，民得安宁。老百姓很怀念他，就叫此山为“刘志洲山”了。这种传说，是当地百姓企盼太平生活的美好愿望的体现。但传说究竟真假，无从考证。

而古志书中说“银山”是因为山石发白，“日



图为明代《万历淮安府志》关于银山的记述



图为坐落于锦屏山东南角今称刘志洲山的银山

出照耀如银”而得名。这是这座山的自然实体的特征,却可考证。一天,笔者与锦屏镇志办李金禹、李金作二同志前往酒店村,在酒店村东王庄人王宝春带领下,到刘志洲山下进行考察。发现此山岩石确实发白,从外表看,很像海州城南的白虎山的石头,白了了的。当地 86 岁的王怀富老人还告诉我们,以前他们在山上打石头,经常会发现石头里面有小颗粒、小石片,太阳一照,闪闪发亮。所有这些,都和《万历淮安府志》对“银山”得名原因的记述完全一样。

比对史实看共性。在比对过程中发现,古今资料在记述这两座名字不同的山体周围发生的历史事件时,都记述了南宋抗金英雄魏胜和李宝水师在这一带抗击金兵的情况。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记述海州良吏魏胜事迹时写道:“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复遣乌锦太师发诸路兵二十余万来攻海州,先遣一军自州西南断胜军饷道。

胜择勇悍士三千余骑拒于石阙堰。金军不能进。逮夜始还,留千人备险隘,金兵二十万来夺,胜率众鏖战,杀数千人,余皆遁去。”(《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影印本第 363 页)而石阙堰就在银山下石湫河上。1993 年 6 月,海洋出版社出版的《连云港群山概览》,在记述刘志洲山及其南首的哑巴山时写道:“哑巴山虽小,却留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八月,金帅完颜亮举兵南下,主帅蒙恬镇国成了魏胜刀下鬼。李宝水师为了配合义军魏胜,屯兵夹山刘志洲山,哑巴山亦是当时的屯兵之处。”并且,还记述了后来发现的、遗存于哑巴山上的战船及“招信军”等当年抗金岩画、石刻。这进一步证明,这两个不同的山名,指的就是同一个山体。

通过以上多方面的资料比对,我们终于找到明确答案:如今所说的“刘志洲山”(包括哑巴山),就是古志书上记述的“银山”!

排查“银山”“消失”根源

那么，“银山”怎么变成了“刘志洲山”？又是什么时候“刘志洲山”进入“官书”而顶去了“银山”之名的呢？

这和我们古海州自清代嘉庆十年（1805年）知州唐仲冕编修刊印《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后，直至新中国成立这140多年间，海州再没有编修过一部完整记述州情的综合性志书有关。其间，虽然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海州人相才编写刊印过一部《胸阳纪略》（上、下册），在书中设有“地部”，但对海州诸山的记述极为简略，除刊登了《云台山记》《锦屏山记》《大伊山记》《羽山记》和《房山记》几篇登山游记外，其他山体连名字都没有涉及。致使“银山”之名，自《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后，再无官方史志予以记述，让其传承。甚至近世当地很多人从没听说过“银山”这个名字，只知道发生在此山的“金鸡怪”和刘志洲在此占山为王，除暴安良之类的传说。而关于刘志洲是何许人，各有一说，民间就有刘志洲“为地方上一位仗义除暴的士绅”；是一位“依山聚众，叛逆朝廷的农民运动的领袖”；是一位“被贬后隐居此山”的“清正州官”等三种版本，众说纷纭，越传越奇。但是，不管哪一种版本，归结到一点，都说刘志洲在此山一带是除暴安良的大英雄、大善人。人心向善，人心崇善，人心思善。于是，当地人便以刘志洲的名字，作为山名，以示对大英雄、大善人的崇敬和向往。久而久之，“刘志洲山”这个名字便叫开了。“银山”之名，再无人提。

“刘志洲山”这个山名，什么时候进入“官书”被正式使用的呢？

笔者通过对现有资料分析认为，极有可能是

始于1983年12月，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地名录（城区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地名工作。还在新海连市时，市政府就开始对市区一些道路、桥梁等地名进行整顿。开始加强对地名的命名、更名的管理。后来，又成立了专司地名管理工作的机构。1983年，市政府在全市城乡各地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当时，锦屏公社刚由市直管划归新海区管理不久。当普查登记人员来此了解此山基本情况时，当地干部群众都以“刘志洲山”这个名字予以介绍、登记。结果，古代的“银山”，便被以“刘志洲山：在锦屏公社酒店大队东部。相传有个刘志洲屯兵于此山，故名”的条目，进入了市地名委员会编印的、新中国成立后港城第一部带有权威性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地名录（城区部份）》第103页。

此后，1993年6月海洋出版社出版的《连云港群山概览》，1999年7月方志出版的《海州区志》，2000年6月方志出版社出版的《连云港市志》，2001年7月沈阳出版社出版的《云台山资源大观》等，基本上都是依据《江苏省连云港市地名录（城区部分）》的资料，记述“刘志洲山”的。“银山”之名，便再没有在各种志书等地方文献中出现。

经过一番“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消失”几十年的“银山”的下落，搞清了今天人们所说的海州区锦屏山南麓的“刘志洲山”，就是古代叫了上千年的“银山”。我们很欣慰，“银山”这段历史将得以传承，可以继续闪现其“日出照耀如银”的光辉形象，为海州区乃至港城的旅游事业作出新的奉献。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淮北嵯韵妆云台

□ 胡可明

江苏省连云港市境内的云台山，唐以前称郁州山，唐及以后称苍梧山。唐李白诗“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宋苏轼诗“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写的都是此云台山。云台山名明朝天启初始称，为江苏省第一大山，其玉女峰高624.4米，为江苏省最高点。云台山原耸立于黄海万顷波涛中，直至清康熙五十年（1711）才与大陆相连。

在云台山脚下黄海之滨绵延的淮北盐场，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两淮盐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淮盐区起源于春秋，发展于隋唐，振兴于宋元，鼎盛于明清。黄海边上历代业盐人善用云台山，善用黄海水，在不断东移、渐变宽阔的海滩涂上，除草铺滩煮海，又以皎洁如雪、量丰味美的淮北盐，妆点着巍巍的云台山。

淮北盐远播云台山美名

云台山以淮北盐而闻名。淮北盐拉扯着云台山走进了中国古典文学，人们在读这些名著时，就直

接或间接地在读云台山。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在其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中，写孙悟空乘木筏离开尚在海中的花果山，外出寻访神仙，被风吹到了岸边，见到海边有人在捕鱼、打雁、挖蛤、淘盐。这见到的淘盐人，当就是淮北业盐的亭户。《西游记》作者吴承恩（1501—1582），明代小说家。据考证，他在50岁时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在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明朝中期，其时淮北盐区生产方式早已普遍采取晒制法，正如《明史·食货志》载：“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所以作者说孙悟空既看到了海边有渔民在捕鱼、挖蛤，有猎人在打雁，也看到了业盐的淮北亭户在晒制淮北盐。

早在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前朝——元朝元世祖至元年间，两淮就有29个盐场，其中云台山下的淮北盐区有莞渚、板浦、临洪、徐渚4个盐场。据《嘉靖两淮盐法志》，明代两淮转运盐使司（治扬州府城内）有30个盐场，其中淮安分司（治安东县）有10

个盐场，淮安分司属下的云台山下，有徐渎、板浦、临洪、兴庄、莞渎5个盐场。其时淮北盐区已经首开我国海盐晒制的先河，使得整个海盐生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吴承恩同为明朝万历年间人的海州人顾乾，著有《云台山志》《云台山三十六景诗》等书。在他的《云台山志》中，载有徐渎场“设于徐渎浦（大村的西北），嘉靖十八年后为海潮所侵，移建大村”。他在《云台山记》文中，也写到了徐渎盐场的随海势东移而变迁。由署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淮北海州分司运判谢元淮主修的《云台新志·卷第十六·丛谭》中，写道明万历年间谢淳重修花果山三元宫时，所购南京上河之楠木，在庙湾海口崩筏，后在云台山麓徐渎场大浦内捞出。还记载明末人吴振勃《筠斋客话》中，云台山下淮北盐区亭户，在“火星潮”时海水“盐卤倍浓，亭户扫盐者以为旺产之候”。吴承恩为创作《西游记》这个宏篇巨著，走遍了云台山。他站在大海中的云台山青凤顶上，环视从徐州南延至今之灌河口的绵延海岸，似乎看到了淮北盐区的先人们，煮海熬波的烟火不绝于目，他把这种景象移植进《西游记》中，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

孙悟空在海岸边看到的淮北盐区的亭户在“淘盐”，确证《西游记》中的花果山正是今之连云港市境内云台山之花果山。如果缺少这极其重要的“淘盐”之景象元素，若想一下子认定这一点，恐怕困难许多。

毛主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次谈起花果山，敲定了《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即是今之连云港市境内的花果山。第一次是1955年10月下旬，毛主席南巡时接见镇江领导人时说：“《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就在你们江苏嘛，新海连市（即今之连云港市）。”第二次是1956年7月，毛主席南巡时接见徐州领导人时说：“花果山、水帘洞就在你们管辖的新海连市，有空可以去看看（其时新海连市为省辖市，受徐州专区督导）。”第三次是1958年4月，毛主席嘱咐离京外出调查研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说：“孙猴子的老家在江苏新海连市的云台山上，你路过江苏，

去新海连市看看孙猴子的老家到底是什么样子。”胡耀邦于1958年4月20日到新海连市视察，向市领导转达了毛主席的这个嘱咐。

《西游记》后来被翻译成朝鲜文、日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瑞典文、比利时文、意大利文、斯里兰卡文等多种语言出版，孙悟空走向了世界，《西游记》走向了世界，花果山、云台山也走向了世界。此外，《镜花缘》《窦娥冤》《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都与淮北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淮北盐使云台山文化璀璨

《连云港市志》载，四五万年前，原始先民就在古海州大地上繁衍生息。北京大学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2005年12月在连云港市举办的座谈会上讲到，连云港古代文化历史连贯，内涵丰富。据有关专家考证，这都是因为有了盐，有了古海州地域上的淮北盐。是黄海水在面海的山石、岭坡、堤滩上的自然积聚、凝结，吸引了古人在这里像“白鹿饮泉”“群猴舔地”“羝羊舐土”“牛舔土盐”般摄取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盐分。至于市境内考古发掘出的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秦汉时代的文化遗存，则是反映了人类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能动地追逐盐、获取盐的生命运动和社会活动轨迹，无一不证明是淮北盐唤醒、催生、滋润、助推了古海州大地的文化、云台山的文化。

史称云台山名始于明朝天启初。且原与古海州隔着一道波浪滔天的“对口溜”海峡，遥遥相望，直至三百多年前才因泥沙淤塞成陆，此时人们才可以“骑马上云台”。只当人们能够丢舟弃楫、骑马上山，云台山才更多地与古海州人密切了联系，更多地承载了古海州的文化。而像血液之于人体一样，在古海州地域上的淮北盐对云台山的文化塑造及传承，就起着血脉一样的作用。

《连云港港志》载：明洪武十七年（1384），为防倭寇侵扰，朝廷实行“裁海”政策，古海州境内包

括云台山在内各大小岛屿上的渔人樵夫农民都被强制内迁。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继续实施“禁海”政策,古海州云台山被裁为海外,被弃置,并勒令“设界防守”“钉桩塞海”,强制“片帆不许入海,粒米不许越疆。”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诏令撤海禁,壮渔樵,迁民复业。这“裁海”、“禁海”至“复海”间,没有影响到淮北盐。淮北盐场遵循盐依海势、场随海移,适时分分合合,正常地生存、发展。虽然清朝起淮北盐区由明朝时5个盐场合并成板浦、中正、临兴3场,其时两淮盐区也由原30个盐场合并为23个,但淮南淮北盐产量都是逐年上升的。淮北盐区不仅为朝廷创造了无可比拟的巨额财富,也成为了云台山下的重要一景。署两淮都转盐运使司淮北海州分司运判谢元淮主修的《云台新志》,被誉为是一部凝聚古人智慧的流传千古的古海州地方文献。《云台新志·胜迹(下)》收录了清人黄申瑾的《云台二十四景》,其第一景为“盐池汇宝”。黄申瑾的《云台图说》载:“登山者必宿板浦场市。市后为盐池,岁产百万金钱,为商贾辐辏之地。”一部《云台新志》,载及淮北盐的内容许许多多,如“东海物华,当以盐为上珍。”“内以丰禹莢(盐业)万年之利。”“岛出白鹿,土有田畴鱼盐之利。”云台山“时在海中,南距板浦、中正两场仅隔一渡,渡口名对口溜,风涛险恶。”“康熙十六年,……奏准复云台于内地。……盐池丰饶,……”,等等。巍巍云台山,物产丰饶,而淮北盐可以说是万类物产中之物华天宝。故《云台新志》在第十一卷《物华》中,收录了谷属9类、蔬属39类、果属33类、木属33类、花属34类、卉属51类、竹属8类、药属65类、禽属38类、兽属20类、鳞属33类、介属19类、羸属19类、货属8类。在“货属”中,盐位居第一。并示出:“谨按:山海之利以盐茶为大端。……是云台今日之物华莫大于盐也。”可见,淮北盐作为一种物品,在云台山物产地位之尊,附着在淮北盐上的或者由淮北盐引起的希冀、追求、财富、文思等文化元素,又是多么的

具有生命力啊!

《云台新志》共有18卷,以第十二卷“票盐”记录了清朝道光年间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两淮盐政,加太子少保的陶澍,在淮北盐区率先实施“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其后,票盐法被推广到淮南盐区,乃至全国海盐区。淮北盐及与唐朝刘晏等的盐法改革一样划时代进步的改革——票盐法,被《云台新志》永久流传,淮北韵味也永远地丰富了云台山的文化底蕴。至于主导票盐法的陶澍两登云台山与同僚、下属的诗词唱和,被《云台新志》收录极多。陶澍最能反映他进行盐法改革心情的诗句“却缘王海疏禹莢,欲引神山渡愿船”等,引得他的好友、后任林则徐等一大批官员、文儒的喝彩与唱和,这些都对以云台山为脊梁的古海州地域文学的繁荣发展有过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淮北盐助云台山香火旺盛

江苏省连云港市境内的云台山是很美的。晚明海州人顾乾著有《云台山三十六景》第一景“灵山香会”,记载云台山“清风顶三元圣宫坐苍梧绝顶,四环沧海,万象森罗。远近香火,虔趋不绝,孟春尤盛,每于上元前后,朝山者如归市焉。”清人黄申瑾之《云台二十四景》亦有第八景“云台铺海”记之。历史资料显示,唐宋以降,古海州地作为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祇就是三元大帝。三元宫始建于唐,重修于宋,明万历年间曾大规模扩建,并得皇帝敕赐,规模宏大,香火极盛。明海州人张朝瑞(1536—1603)官至南京府丞,掌大鸿臚,后摄应天府。他作有《东海云台山三元庙碑记》,载有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时署海州事、判官唐伯元创建三元专祠以供捧香奉火,引起社会各界、市井下民群起集资,建起了三元大殿。

清朝康熙十六年(1678年)重建三元宫,康熙三十一年(1693年)敕赐“遥镇洪流”匾额,其时僧众达数百人。乾隆中与嘉庆八年(1804年)又有

修葺。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江总督、官保尚书陶澍又主持了大修三元宫。

一座三元宫的创建、扩建、修葺、大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古海州地域的宗教发展轨迹，也昭示了历朝政府用精神枷锁对人民的思想统治，更能影射出淮北盐对云台山宗教发展的奉献，在宗教士僧和信教群众寻找心灵归属的路上，铺好了路基。

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宗教的神秘偶像实际上就是社会利益（特别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化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写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第1卷第1页则一言道破宗教的本质，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唐宋时期，淮北盐业处于发展起步和振兴初期，就其一个地域而言，对朝廷的贡献额还没有走到前列。而是时，云台山尚处海中，汹涌波涛使得山体或隐或现，离开舟楫人们无以登山，香火无以旺盛，故而不可能企望当时的三元宫有如何的规模 and 神影仙气。古海州地在1244—1368年元朝统治的120多年间，如忽必烈言“……民力凋敝莫甚”，所以朝廷及民力均不能承担三元宫的建设之费。明清朝则不同，虽然元朝至清朝六百年间，古海州地一直农衰不振，但淮北盐业上升为鼎盛时期，淮北盐对朝廷的贡献大于其他地区，两淮盐的中心也逐渐由淮南向北移到了淮北盐区，这就使得明清皇帝对古海州地的宗教寺庙宫宇建设有了适当的关注。

康熙敕赐三元宫“遥镇洪流”匾额时，云台山与陆地间的海峡渐见淤塞，接壤在即。淮北盐场滨海，总随海势向云台山靠拢，《云台新志》附图在《云台山总图》中的朱紫山下小村附近，就标示有“徐读旧场”，在凤凰城西就标示有“于公瞳新滩”等。康熙深知淮北盐税赋在朝廷府库中的份量，所以他在三十八年（1670年）南巡中，虽未亲驾云台山，仍命侍卫五哥等到云台山进香。

淮北盐之于康熙着实在是太重要了。《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家为什么败落？这与康熙有关，也与淮北盐有关。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的奶妈，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卫、伴读，康熙对曹家是恩宠有加，曹家三代人在江宁织造作官，世代相承五十年，曹寅还在康熙四十三年（1705年）至四十九年（1711年）干了四任两淮巡盐御史，其中与他交替也任了四次的是他的妻兄李煦。是两淮盐政、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的巨额亏空，曹、李在康熙时尽力弥补而未尽数完账，至雍正帝时曹雪芹的父辈（祖父曹寅已逝）曹頫被革职抄家。但还蒙恩少留在京房屋并酌量拨给人口，以资养赡。这又是为什么呢？康熙、雍正父子都了然于心。曹、李职上帑银亏空，皆用于康熙南巡。康熙六次南巡，曹寅奔走于扬州、江宁等地，仅在此两地就接驾四次。康熙坦然承认：“朕屡次南巡，地方官预备纤夫、修理桥梁、开浚河道，想皆借用帑银；……填补不及，遂至亏空如此之多。”“至于修建行宫，必然亦借用帑银。”“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因公借用之名，盈千累百，馈送于人。若加严训，隐情不无毕露。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雍正帝虽一反乃父曲意姑息宽容之志，严加查办，但也颇手下留情。

很清楚了，为什么封建帝王，特别是大清皇帝康熙以及后来的道光，对云台山的宗教建设那么上心呢？是帑银，是淮北盐！

现在云台山花果山水帘洞壁上的“印心石屋”四字，是道光皇帝亲笔题赐于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陶澍的。陶澍题配的对联是：“百丈水帘，自古无人能手卷；一轮月镜，迄今何匠敢行磨。”也是陶澍在淮北盐区率先施行盐法改革取得重大成功，黄金白银像黄海的潮水般涌进了皇家国库，皇帝对陶澍的一大奖赏。当然，皇帝的敕赐匾额、御笔亲题，也增添了云台山的神韵，引得花果山客旅如潮、香烟弥空。

（作者单位：江苏连云港淮盐文化研究会）

《西游记》中的“祭赛国”与“金光寺塔”原型探析

□ 蒋金明

唐僧师徒西行至一座城池，下马过桥入门观看，忽见三街六市有数十个小和尚，个个披枷戴锁。唐僧叫悟空上前问一下“为何这等遭罪”，小和尚说：“我等是金光寺负屈的和尚。”又说：“三年前秋天，夜半时分下了一场血雨，把这寺里黄金宝塔给污了，皇上与众臣说我寺里僧人偷了塔上发光宝贝，所以几辈和尚遭罪。”唐僧听到这情况，叫悟空买扫帚准备扫塔。“看这污秽之事何如？不放光之故何如？”小和尚立即去买来扫帚交于悟空，悟空协助唐僧前去扫塔。唐僧自下层往上面扫，扫至第七层上已觉困倦。悟空叫师父歇着，他替唐僧一层一层往上扫，又扫至第十二层，正扫着听得塔顶上有人言语。孙悟空顿觉奇怪，钻出塔门，踏着云头观看，见第十三层塔上坐着两个妖怪，正在喝酒猜拳，被孙悟空捉住交于师父。怪物供道：“我们是乱石山碧波潭万圣龙王差来的，一个

叫黑鱼精，一个叫鲇鱼怪（鲇鱼：原连云港地区人们称之为鲶鱼，又叫鲶鱼蛙子。此鱼体型像蝌蚪，大肚皮，大嘴巴。这和书中对鲇鱼解释是一致的——笔者）。第二天他们又将两个妖怪交于国王发落。两个妖怪交代：“有个万圣龙王，他住本国东南，潭号碧波，山名乱石。三年前万圣龙王率许多亲戚，与招赘九头驸马合谋做贼，先下了场血雨，后把舍利偷吃……我俩是差来的小卒。”

黑鱼精等的两次交代，已清楚地说明金光寺宝塔上的发光舍利子，是东南方碧波潭万圣龙王和九头怪合谋偷盗。唐僧师徒拯救了金光寺和尚的生命，又还了他们的清白。

从前面内容得知，万圣龙王居住本国东南乱石山碧波潭。笔者通过研究分析，南云台山“东磊石海山碧龙潭”是书中“乱石山碧波潭”原型（详见拙文《东磊和“西游记”中的“乱石山与碧



金光寺塔原型——海清寺阿育王塔

波潭”》)。今东磊石海山碧龙潭确实在花果山的东南方向，按此说来今东磊石海山碧龙潭的西北方应能找到书中所说金光寺宝塔原型。从东磊碧龙潭西北方位分析，今花果山下确有一座宝塔，即海清寺阿育王塔。再向西北方山下，400多年前《西游记》成书年代是一片大海，不会再有宝塔。因此可以说，今花果山下海清寺阿育王塔，是书中金光寺宝塔原型。

碧龙潭和海清寺阿育王塔的位置确立了，说明今花果山和其东南的东磊石海山范围，为书中所说的祭赛国。西游作者为什么把这里叫祭赛国呢？根据清《嘉庆海州直隶志》等地方志书分析，400多年前《西游记》成书年代，南云台山香火旺盛，有多座受人尊崇的寺庙，如花果山上的三元宫和山下的海清寺与阿育王塔，及东南东磊山中明朝皇权重视的延福观等。第六十二回中宝塔

之事国王“请道士打醮，和尚看经，答谢天地”，说明当时明朝皇帝对云台山佛、道两家都很奉崇。社会上的崇拜皇帝，拥戴皇帝，各级政府官员感恩皇帝，积极进奉香火，香客们受其影响，会像潮水般地拥至而来，花果山到东磊等处进香形势，是盛况空前的。

西游作者为什么把花果山到东磊这两个相连范围，说成“祭赛国”呢？前面讲了，这里范围庙寺多，敬奉香火人就多，这就形成了声势较大祭祀活动。笔者分析认为，“祭赛国”从字义上讲，“祭”字就是祭祀祭拜之意。“祭”要用祭品与香火，对神、佛、心灵祭拜祈祷。“赛”就是比赛的意思。两字合来就是祭祀比赛。日常祭祀活动中没有比赛形式，可是实际祭祀活动中，又存在比赛现象。走近当今祭祀现场，就会发现，香客们多施香火，敬奉神佛多给钱物，生怕自己给香火少了，给钱

物少了，神灵会对自己有看法，香客们纷纷争予奉献。这种现象类似比赛。所以说西游作者，把这地方“祭祀”活动说成“祭赛”，是符合社会现象的。称这个地方叫“祭赛国”，是在情理之中。

祭赛国金光寺宝塔发光之宝被盗问题澄清了，但原来宝塔发光之宝尚未找到，国王宴请唐僧师徒，再请圣僧为之取宝归塔。孙悟空、猪八戒接受国王重托，二人挟着黑鱼精鲇鱼怪两个小妖，向东南乱石山碧波潭去了。二人到了碧波潭，将黑鱼精耳朵割了，鲇鱼怪下唇割了，让其二怪告知龙王，赶快将发光之宝送还，如说“不”字，将剿灭龙宫。后又将二怪锁骨锁上，带着铁链血

淋淋地被扔进潭里。龙王听两个小妖之说，龙王害怕，可他之婿九头怪，仗他有点本领，冲出碧波潭和孙悟空争斗。第一场争斗在乱石山顶至山前之间，悟空与他打斗30余回合，不分胜负，“猪八戒立在山前”，看准有利机会，将九头怪捉上一耙，九头怪看势不利，展翅斜飞到山前，张开大口，咬着猪鬃把猪八戒拖回碧波潭。后在孙悟空帮助下，又将八戒救出。第二场争斗在乱石山前。孙悟空、猪八戒和杨二郎共同打斗九头怪。二郎的小天狗，将九头怪伸出一个头咬掉，使之败北逃走。孙悟空至潭里打死龙王龙女，取回发光之宝交于国王，国王与众臣大喜，盛赞圣僧之功。将发光



东磊石海神犬石

舍利子安好塔中，立刻发出霞光万道，瑞气千条，依然八方共睹，四国同瞻。祭赛国又有好运来。

前面笔者分析出，石海山是乱石山的创作原型。那在今石海山上，是否能找到《西游记》中大战九头怪的古战场及其相关信息呢？在东磊碧龙潭西侧的石海山上，石海山前有一“猪”的象形石。这象形石，头很像猪头，身体是站立着的，体型是大肚皮，胸前还有两个蹄足似的。此石也处在山前，又是站立形态，这和《西游记》书中说“猪八戒立在山前”情况非常吻合。另外在碧龙潭上方100米高的山坡上，有一“狗”的象形石。“狗”的出现使我们想起杨二郎帮助悟空打斗九头怪，其中小天狗立了大功。今天在石海山仍能看到“猪八戒立在山前”，和“立了大功的小天狗”。这两个符合书中情节的“猪”“狗”被发现，进一步证明此处的石海山，是《西游记》中乱石山原型里的两场争斗所在地。

《西游记》第六十三回，乱石山前的两场打斗故事，是《西游记》作者从“猪”“狗”的存在创作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想象出，《西游记》作者当时在东磊查看东磊石海山碧龙潭环境时，他先发现了狗的象形石。为了把“狗”神化起来，首先想到他写“大闹天宫”时杨二郎与他的小天狗，于是他构思出杨二郎与神通广大的小天狗，在打猎回家路过“乱石山碧波潭”时，进而引申孙悟空挽留杨二郎等共叙旧情、通夜餐饮等一系列情节。第二天天亮后，杨二郎又帮助孙悟空、猪八戒打斗九头怪，以及机灵的小天狗，一口咬下九头怪腰里伸出个头，使九头怪败北逃走之故事。猪象形石，《西游记》作者是很容易运用西游记的主人翁之一——猪八戒，站在山前和

孙悟空共同打斗九头怪场面。“猪、狗”象形石引发出《西游记》作者一连串灵感思维，创造出第六十三回故事内容。可以这样说，“猪”“狗”两个形象的存在，是他这段故事创作之源。

由此，能在云台山中找到《西游记》许多创作原型，是否可以这样说，《西游记》并非是唐僧西天取经过程中之事，而是作者利用唐僧形象，吸收社会上唐僧取经路上离奇传闻，主要地理内容与云台山具体地形地貌、地方传说，有机地将其糅和在一起，让人觉得是真的西游故事。笔者研究书中乱石山碧波潭内容，又与今天东磊实际环境调查得知，东磊石海山上许多现象与书中乱石山故事情况雷同，能在云台山上发现《西游记》故事中的环境现象，所以说《西游记》非西游记事，可能是东游记事——是一部云台山环境被神化了的游记。难怪连云港有位先辈写出：“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此言科学性尚待进一步证实，但笔者本篇文章可以为此作为一个例证。

现在再来谈一谈“猪八戒”象形石。云台山上可能会找到多个猪象形石。连云港市是《西游记》发祥地，地方人都为某地“八戒”争形象。笔者认为，哪个是、哪个不是，都需有根据。最好的根据，就是《西游记》书中有所证明才行。东磊石海山前有猪八戒站立象形石，符合书中“猪八戒立在山前”之说。笔者认为此石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代表形象。

在旅游业大发展的今天，猪八戒形象景点的发现，给这里的旅游增加了一定的活力。猪八戒“立在山前”，将迎接更多热爱西游文化的人到来。

（作者单位：市开发区中云办事处）



云湖回忆——徐圩史话

□ 张树庄

漫步在徐圩新区云湖水利风景区，这里清新的环境、美丽的景色令人陶醉。云湖边上“全国第一大张拉膜”高高耸起，在骄阳的映照下分外耀眼。拉膜高 31.5 米，面积 3100 平方米，投影面积可达 2638 平方米。走在拉膜的阴凉下，眼前 1.24 平方公里的湖面碧波荡漾，飞鸟轻翔。远望静卧在碧波之上呈白色弧形的景观桥，倒影在水波上晃动。天光云影，徘徊水面，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而我回忆最多的则是这块神奇土地的过往和现在。

徐圩，原在东陬山东六七里的地方有一条由徐姓人家开辟的大圩子，称作徐圩坨，后在这里建徐圩坨码头，从此这块土地就叫做徐圩了。

民国元年，徐圩地区属灌云县。民国 3 年，灌云行政区为 6 市 14 乡，徐圩属苍梧北乡。苍梧北乡东至蒿头（即东陬山旁的蒿子头）35 里，西至杨家沟东 3 里，由华盖山西向北，至黄九堰东

石人 10 里，南至朱麻村 10 里，北至大海 30 里。人口 7280 人，乡驻地在小板鲃。

1929 年，实行区自治，该地区前后划为灌云县第 9、第 10 两区，旋即合为第 7 区，南至东辛、南城、朐山东头，北至大海，东至大海及东陲山北，西至新浦东头，全区共分为 3 镇 17 乡。徐圩属中富乡（驻板桥），中富乡取中兴疃、富民疃两首字命名，包括大小板鲃、南方洋等处盐圩。民国 24 年，全县由 10 个区并为 6 个区，辖 107 乡、18 镇。第一区公所在板浦，辖 7 镇 26 乡，有东陲乡、中富乡。后东陲、中富两乡合并为东陲乡，有 10 保 100 甲 1013 户 4834 人。1946 年连云市下辖四区，第 3 区驻南城，辖南城、龙山、关里、东滩、东磊、中富 6 乡镇。

1948 年 11 月 6 日，中正场解放，隶属淮北盐特区盐场公署，不久改为淮北盐务管理局。徐圩属盐区，1948 年建方洋乡。1953 年 6 月，盐区撤销，成立猴嘴、陈港两区，猴嘴区下辖大浦、猴嘴两镇和台南、台北、方洋、徐圩、塔山 5 乡。

1956 年猴嘴区板鲃乡驻小板鲃，828 户 5763 人，土地 1240 亩，面积 207 平方公里。方洋乡驻马二份，371 户 2228 人，面积 53.7 平方公里。徐圩乡驻徐圩，1126 户 5651 人，土地 1924 亩，面积 225 平方公里。1957 年 1 月，猴嘴、陈港两区又合为盐区，下辖猴嘴、大浦、燕尾、陈港 4 镇及台北、塔山、板鲃、方洋、徐圩、洋桥、灌西、灌东、新滩、淮河 10 乡。1958 年 3 月，盐区区划调整，不再设乡，下辖猴嘴、板鲃、徐圩、燕尾、陈港 5 镇。

1959 年 2 月，盐区与盐场合并，成立盐场人民公社，下辖猴嘴、板鲃、徐圩 3 个分社。板鲃人民公社驻板鲃镇，人口 5248 人。徐圩人民公社驻徐圩镇，人口 4273 人。

1963 年 3 月，盐场人民公社撤销，场镇分开，建盐区办事处，下辖猴嘴、板鲃、徐圩 3 镇。1972 年，

徐圩镇和徐圩盐场机关迁移辛高圩，辛高圩成为繁荣的小集镇，为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83 年 7 月，盐区和南城区合并，建立云台区，下辖 4 乡 4 镇。4 镇为：猴嘴、南城、板桥、徐圩。

1988 年云台区徐圩镇，辖辛高圩居委会，村民组织 20 个，1039 户 2680 人。徐圩居委会，村民组织 4 个，81 户 151 人。后五圩村，村民组织 4 个，213 户 883 人。东陲山村，村民组织 6 个，179 户 967 人。

2001 年 11 月，徐圩镇划归连云区。2005 年辖内有后五圩村、东陲山村 2 个行政村和 1 个辛高圩居委会。镇政府设在辛高圩。

2010 年成立徐圩街道办事处。徐圩街道辖区规划管理总面积 247.6 平方公里，北起规划刘圩港河中心线，西至烧香河支河西岸（含香河村、东陲山村），南至善后河、车轴河中心线、埭子口北岸，东至海堤。街道辖徐圩港区、临港产业区、徐圩盐场和辛高圩社区、东陲山村、香河村。户籍人口 8000 人，流动人口 30000 人。海岸线长 28 公里，拥有滩涂 1300 余公顷，耕地 530 余公顷。

二

徐圩盐场历史悠久，自其前身莞渎场创建以来，至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历史上，徐圩是一个产盐重镇，这里拥有淮北两大盐场——徐圩盐场和台南盐场，是淮盐文化的发祥地。淮盐滩晒制作技艺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项目，更是淮盐文化的核心。这里的盐民从传统的“八卦滩”晒制技艺到现代的“塑苫”滩晒技艺，使盐业生产实现了飞跃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优质的食盐，为化工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徐圩盐场的前身——莞渎场，元代元贞元年（1295 年）两淮盐运司淮安分司设立，场署原在莞渎镇（今灌云县杨集镇西南）。元至元二十八

年（1368年）重建莞渚场，隶海州府淮安路。明崇祯年间（1638—1644）隶两淮盐运使淮安分司。清顺治年间（1644—1661）莞渚场隶属淮安分司。清代乾隆元年（1736年），莞渚场裁废，遂割板浦场的中正、小浦、东大、东辛四疃，成立中正场，场署在中正疃青龙桥东北（今灌云县东辛乡），隶两淮盐运使淮安分司。清道光（1821年）前后，花垛疃裁废，新铺中兴疃（又名东陬山）、富民疃（又名蒿子头），整个场区逐渐东移。清光绪年间（1905—1908），中正、小浦、东大、东辛四疃先后废除（后，改疃称场务所），池滩移至东陬山、蒿子头一带，建立港东、港西、公圩场务所。徐圩属中正场。

民国元年（1912年）中正场隶海州总场长。民国三年隶淮北总场长，改称淮北盐务局，后裁废。中正场下辖：中正放盐局、太平放盐局。场在徐圩地区，下辖港东场务所、港西场务所和公二圩场务所，又下辖8个分所，管辖40条圩子。其中卞骆圩分所、西临分所、西方圩分所分别管辖东徐圩、辛高圩、西徐圩。民国4年隶淮北盐务局。民国20年隶两淮盐运使公署，民国21年，中正场辖东陬山放盐处和张圩隳放盐处，在徐圩地区设3个区，即港东区，领22条圩子；港西区领22条圩子；方洋区领10条圩子。以后池滩扩建。圩子增加到54条，机构扩大，并下辖小高圩、老唐圩等6个稽核分所，专管稽查盐政和税收。1934年隶财政部两淮盐务管理局。日伪期间，属淮海区盐务管理局。

1948年11月6日，中正场解放，隶属淮北盐特区盐场公署，不久改为淮北盐务管理局。东半场成立方洋场，驻徐圩，下辖东港、西港、深港、方南4个场务所。1949年3月27日，改属两淮盐务管理总局。10月15日撤销总局，属华东区盐务管理局淮北盐务局。1950年属淮北制盐公司，后又改为江苏省轻化工厅淮北盐务管理局。1950

年4月，成立方洋场管理处和制盐公司。1953年11月，原淮北6个场合并为4个场，方洋、台南场合并为台南盐场，场部在徐圩。1955年4月，淮北4个场划分为10个场，方洋、台南两场分开，方洋场改为第五制盐场，原方南所11条圩子划归第四制盐场，驻马二份。1958年5月，淮北10个场，改为7个场，第五制盐场改为徐圩盐场，原方南所11条圩子又划回徐圩盐场。1958年12月隶属新海连市盐务管理局。

1963年12月，11个工区并为6个工区，即方南、严港、管港、西港、深港、东港工区。1966年又增设新港工区。1971年新设新生工区，至此共8个工区。80年代后，拥有9个工区。1983年4月隶属江苏省盐业公司，1998年更名为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5年，徐圩盐场总面积97.17平方公里，徐圩盐场下辖9个产盐养殖生产服务区，3家民营企业。有1561户5042人。原盐年生产能力30万吨，养殖总量5000吨，工业生产总值7335.04万元。2015年，徐圩投资公司生产原盐8.2万吨，集运原盐11.35万吨。

三

徐圩这块广袤的土地，是英雄的土地。历代生活在这里的灶民为守护这片土地曾经与土匪、倭寇、日伪军做过坚决的斗争。

东陬山位于镇西南部，处烧香河、善后河、车轴河的汇合处，海拔86米，面积0.43平方公里，自古以来是海防屯兵之地。明代这里曾经遭受倭寇的侵扰，人们英勇抗击倭寇，留下了很多传说和历史遗迹。明代，在东陬山上建有六勇祠，海州通判范永官报祀征倭阵亡陈升等六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明季倭寇肆虐，勇士敌忾，奋不顾身，报以芟其（祭祀所用之高粱，这里指祭祀），虽秩典无文，而义魄为雄，不可废也。”东

陬山顶还有一座三义祠，这里祀奉的是海州人周淇等三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人物》：“周淇：字海濒，海州人。有胆略，善骑射，以细瓷末实甲。万历（1573—1620）间，有倭警，州牧征淇御之，有功，……州人祀于东陬山之西滩，名三义祠。”

《连云一瞥》的作者许绍蘧在编写该书的时候，曾专门到东陬山去采访此二祠，并写了一首《东陬山访三义、六勇祠》的长诗，摘要录此，以飨读者：

“灌邑嘉隆倭屡寇，民不知兵不敢斗。海中游戈听诛求，守望相助防困兽。

前有三义真奇才，以逸待劳潜蒿莱。贼舟泊岸立未定，大呼杀贼声如雷。

后有六勇亦壮哉，风云叱咤惊尘埃！碧血溅草气犹怒，倭人胆裂心如灰。

乡人食德思报德，紺宇琳宫映山色。采苹采藻岁不休，为酬当年杀悍贼。

典秩无文心力诚，毅魄联翩享血食。

……

忠魂日暮松楸哭，点点鬼灯红道周。往事已非那可说，一腔热血洒千秋。

假令昔贤今尚在，执鞭欣慕志亦酬。”

1937年日本侵略军对连云港地区狂轰滥炸，国民革命军游击第八军第三总队就驻守在东陬山，预防日军从埭子口登岸。第三总队长是胡文臣。胡文臣（1888—1938），字相卿，天津市杨柳青人，出身武林世家，幼承父志，精通武术。那时灌云东部，特别是南北二十队一带，盗匪经常抢劫百姓财物，胡文臣为保一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有匪情，他便率领部队为民剿匪。在灌云东部一带有潘立渺、王大标等为首的股匪，到处打家劫舍，作恶多端，鸡犬不宁，人心惶惶。胡文臣当时亲率部队，尾随追剿，经十余天拼搏，终获平定，广大群众，无不感念。事后，又将匪杨实之、刘正保、孙小四等罪大恶极者，分别押赴肇事地

点的龙王荡南四队车轴河北岸小闸口处决。1937年小伊山一带出现匪患，殃及杨集镇，数百户灶民被洗劫一空，胡文臣率全体官兵参与追剿，当强攻被土匪占据的北四队前腰庄时，胡身先士卒，英勇果敢，当时深得上级赞许和群众拥戴。南北二十队人民，在龙王口为他立了一块“除暴安良”的石碑，以表彰他保护民众的功绩。1938年9月，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云台山。当离开东陬山时，沿途众多百姓，自发地在自家门前摆一张桌子，放上一面镜子和一碗清水，以表示对胡总队长多年来为民除害，廉洁奉公，清如水、明如镜的无量功德的感念情深。胡文臣1938年8月在东陬山山洞中题写的藏军洞诗刻至今犹在：“倭寇犯我海疆，飞机到处逞强。为免轰炸殃及，依山筑室避将。”胡文臣因在连云港大桅尖英勇抗击日军侵略，荣膺一级传令嘉奖，并晋升为少将军衔，为少将总队长。1938年底，胡文臣奉命开赴泗阳县抗击日军，英勇牺牲。1982年，国家民政部追认胡文臣为抗日烈士。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一书中以《胡文臣烈士》为题，记述了他的事迹。有一首诗写道：

“堂堂胡氏文臣，佼佼炎黄子孙。抗倭名列青史，护国功在山城。

魂凝碧血芳草，义接浩海长风。东陬石屋千古，苍生永念斯人。”

1948年在解放军即将解放徐圩时，这里的人民从敌人的手里夺来枪支，打击了敌军，迎来了亲人解放军。

四

20世纪90年代，江苏提出建设“海上苏东”，之后，沿海进入“四沿”生产力布局。2004年3月，《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启动。2006年10月，提出要在连云港徐圩新区建设临港产业基地。2008年5月初，国务院召开总理办公会议

专题研究江苏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09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7月正式批准实施，这标志着江苏沿海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将连云港作为江苏沿海开发的龙头，提出要依托深水港口资源，在连云港南翼布局钢铁、石化项目，建设江苏沿海新型工业基地。2009年3月5日，连云港市委召开常委议港会议，决定在徐圩建设新的大港口。作为连云港市“一心三极”城市布局的重要构成部分，徐圩新区是拓展港口综合服务功能、开发新的战略增长极的重要载体。江苏省决定将连云港高新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连云港市也做出重大决策，全力推进徐圩片区开发，将徐圩片区打造成为“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和江苏沿海新型工业基地”三大战略目标，并组织编制了《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概念规划》，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设计开始启动。

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先导区——徐圩新区，位于连云港市城区东南部，总规划面积约467平方公里，其中，海岸线长34.9公里，徐圩港区约74平方公里，临港产业区约240平方公里，现代高效农业区约153平方公里。依托陆桥经济

带，面向东北亚，融入长三角，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服务中西部和淮海经济区，构筑国家东中西合作发展示范区（先导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和江苏沿海新型工业基地，打造江苏沿海新的经济增长极。

连云港徐圩港区总规划面积74平方公里，总设计吞吐能力4.5亿吨。目前，港区已具备10万吨级通航条件，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和3个液体化工泊位已投入使用，6个3至10万吨级码头泊位正在施工，将于今明两年陆续投用，建成后港区将具备4000万吨货物吞吐能力，基本满足后方临港产业需求。

徐圩新区是连云港市拓展港口功能、开发新的战略增长极的重要区域，徐圩新区的发展能够更好地发挥港口核心战略资源的作用，推动连云港国际性海滨城市建设进程，增强带动苏北发展、推动江苏沿海开发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中国中西部地区崛起振兴和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连云区地方志办公室）

从赣榆走出的三国名将唐咨

□ 徐 亮



漫画唐咨

唐咨，三国时期利城郡（今赣榆西部一带）人。在群英荟萃的三国时代，唐咨似乎声名不显，但事实上，唐咨在吴官至左将军，封侯、持节，后为魏安远将军，是一位有相当份量的历史人物。他不仅被列入《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附传中，其事迹还屡见于《魏书》《吴书》，这对惜墨如金的史家来说是不多见的。

唐咨登上历史舞台缘于黄初六年（225年）在利城郡爆发的一场兵变。《三国志》卷一《魏书·文帝纪》载：“（黄初六年）六月，利城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讨平之；其见胁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附唐咨传》载：“唐咨本利城人。黄初中，利城郡反，杀太守徐质，推咨为主。文帝遣诸军讨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吴，官至左将军，封侯，持节。”

有些学者认为，贪官酷吏的贪残淫逸是激发

利城兵变的主要原因。在那个时代，底层郡兵饱受剥削压榨的境遇不难想象，但如果真的仅仅是小部分郡兵自发的哗变，青徐二州地方武装应该就足以平定，不需要动用中央禁卫军，更不需要魏文帝曹丕入驻谯徐地区亲自处置叛乱。由此可见，利城兵变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

利城郡属青徐地区徐州治下，以臧霸、吴敦、尹礼、孙康等人为主的青徐豪强依附于曹操的同时，又在曹操阵营中自成系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曹操在世尚能驾驭，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曹操去世，矛盾便立即爆发了。

《魏志·臧霸传》注引《魏略》：“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但对当时的曹丕来说，顺利继承王位，安定大局更为重要，因此，他不得不“抚而不讨，以俟异日”。

222年10月，自觉已掌握大局的曹丕第一次征吴。战后，臧霸即被剥夺了兵权，入朝任执金吾，虽礼遇有加却无权柄。随后，曹丕又在224年、225年两次发动广陵战役，借机改易青徐地区将守，解除吴敦、尹礼、孙康或他们后任、部属的兵权，这进一步激化了曹魏政权和青徐地方势力的矛盾，以致发生了有相当规模和声势的利城兵变。

唐咨是利城郡人，当时可能是一名中下层的武官，在利城郡地方和郡兵中都有较高的威望，众人信服，因此被推举为主。在唐咨的率领下，加上青徐地方势力的支持，这次兵变的规模很大。曹丕连调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率兵与青州兵、徐州兵共同镇压，并且亲自在谯徐地区处理平叛事宜，宣布“其见胁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双管齐下，最终顺利地平息了这次兵变。

利城兵变是地方性事件，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但其影响可谓深远。通过平息兵变，曹丕稳定了

曹魏政权，巩固了北方的统一，魏国国势愈发强大起来。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卧冰求鲤”的王祥，他当时任徐州别驾。《晋书·王祥传》中记载，他在这次平乱中“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王祥正是通过这次平乱，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地位逐渐上升，最终成为魏晋重臣，琅琊王氏几百年的辉煌历史由此开启。

兵变失败后，唐咨“自海道亡入吴，吴人以为将军”。利城郡临海，便于唐咨从海上南奔孙吴，而孙吴应是出于“千金买骨”的目的，对唐咨委以重用，授予将军职位。从此，唐咨便留在孙吴，率军东征西讨三十余年，威名赫赫。

234年，庐陵人李桓、东冶人随春、南海人罗厉等同时起义。235年，孙权诏令吕岱督率刘纂、唐咨等分路讨击，至次年3月“中郎将吾粲获李桓，将军唐咨获罗厉等”。

239年10月，驻临贺郡的廖式起兵反叛，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拥兵数万人，兵锋一度直指零陵郡和桂阳郡，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人心震恐。孙权派吕岱和唐咨南下平叛，“攻讨一年破之，斩式及遣诸所伪署临贺太守费扬等，并其支党，郡县悉平”。

252年12月，曹魏出动15万大军，兵分3路，向孙吴的东西两个方向进击，其中征东大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率军7万攻打东兴。东吴太傅诸葛恪亲自率军4万日夜兼程援救东兴。

诸葛恪以丁奉、唐咨、吕据等为前锋，翻越大山向西进发，因山路狭窄，大军行进缓慢。为了争取时间，丁奉请各军让开通道，由他率3000人先行。这时北风劲吹，丁奉命船队扬帆急进，两天即到达了东兴堤东南的东关，屯兵于徐塘。

当时天降大雪，气候寒冷，魏军各将正置酒高会。丁奉发现魏军前部兵少，对部下说：“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于是命令士卒解下铠甲、

丢掉矛戟，只戴头盔，手执刀、盾，裸上身沿堤进发。魏军见吴军如此装束，都嘲笑其太过愚笨，根本不加戒备。吴军乘势登上堤岸，直接向魏军冲杀过去，一举攻破魏军前屯。这时，唐咨、吕据等人也相继赶到。魏军腹背受敌，非常恐慌，很快被打败。魏前部督韩琮、乐安太守桓嘉等均战死，魏军被歼数万人，损失军资器具牛马不计其数，此战是孙吴建国后与曹魏作战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史称“东兴大捷”。

265年，吴征北大将军文钦率唐咨、吕据、刘纂、朱异等人带兵自江都入淮泗，逼近曹魏青徐兖地域，这令本就坐卧不安的魏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的诸葛诞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位高权重的诸葛诞为何会有这样的表现呢？这要从当时曹魏的政局说起。

239年，魏明帝曹睿病故。在他死后，曹魏政权基本上分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在司马氏集团连续多年，不遗余力的打击下，曹氏集团的势力逐渐丧失殆尽。不甘心坐以待毙的曹氏集团，以王凌、毌丘俭为首先后在251年和255年两次起兵于淮南，但均以惨败告终。同为曹氏集团代表人物的诸葛诞“与玄、颙等至亲，又见王凌、毌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并“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司马昭自然不会养虎为患，他名义上征召诸葛诞为司空，实则剥夺其兵权，逼其造反，以尽快除掉反对司马氏的势力。恰在此时，文钦、唐咨等人进军淮泗地区，这成为诸葛诞兴兵反叛的加速剂。



公元257年三国地图

257年5月，诸葛诞“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綝，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历史上将这次叛乱与王凌、毌丘俭的两次叛乱合称为“淮南三叛”。

起兵后，诸葛诞派长史吴纲领着小儿子诸葛靓至孙吴求助。吴人得信大喜，派唐咨、王祚、全怱、全端等率兵三万，秘密与文钦一起来接应诸葛诞。这时，魏镇南将军王基刚到，率领诸军包围寿春。还没形成包围之势时，唐咨、文钦从城东北凭借山势，率众冲进城中。

6月，大将军司马昭率领26万大军征讨。他屯兵于丘头，派王基、陈騫等人四面合围，将城包围了两重，开挖堑壕、修筑堡垒。又派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人，率精锐部队为机动部队，防备孙吴的进攻。文钦、唐咨等几次想冲出包围，都被击退。吴将朱异率重兵出征，又被州泰等人打退。城中粮食渐渐短缺，外援又到不了，众人没有倚靠。在这种情况下，蒋班、焦彝、全怱等人先后投降。城中士兵无不震惊恐惧，不知所措。

258年正月，诸葛诞、文钦、唐咨命人打造许多进攻的武器，连续五六天，不分昼夜，强行从南面突围。包围的军队用发石车、火箭等还击，箭石如雨、尸首遍野、血满堑壕。唐咨等人无奈

只能又退回城去。战事不顺、粮食短缺，又加上本来就有矛盾，诸葛诞情急之下居然将文钦杀害，守军人心浮动、饥饿劳顿，投降者数以万计。此时诸葛诞、唐咨已无计可施，司马昭先命文鸯、文虎出面召降，后又亲自督阵，四面出击，很快便破城而入。诸葛诞被斩首，夷三族。唐咨、王祚及诸将降魏。

寿春之战三方出兵合计超过45万，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熟知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甚至大于魏灭蜀、晋平吴的规模，是三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寿春之战取得胜利的同时，司马氏在长城（今陕西周至西南）一带还与蜀军作战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这表明司马氏“亡魏成晋”、平蜀灭吴的局势已不可逆转。

寿春之战后曹魏委任唐咨为安远将军，表明曹魏优待降将的态度以招徕蜀吴将吏士民。在伐蜀战争中，钟会就以此宣告蜀汉：“文钦、唐咨为国大害，叛主仇贼，还为戎首。咨困逼禽获，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侯；咨与闻国事。”唐咨晚年奉命在海边督造大船，准备征讨东吴之用，此后史书中再无记载，想来是得以善终的。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委党史工办）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六）

——明清时期海州行政机构设置（下）

□ 刘凤桂

清代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

满清自 1683 年统一全国，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封建统治。清代在入关前，各种行政制度已初具规模，全国统一后逐渐完善起来。中央机构仿明朝的制度而有所改变。设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内阁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和学士，由满人和汉人分别任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原先是议政大臣会议，雍正时改称军机处，使国家最高决策权更集中在皇帝身上。

清朝沿袭明朝传统，设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管部的大学士及尚书、侍郎等称堂官，部下属各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主事以下的七品小京官称为司官。

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

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等。

六部之设，与明朝相同。但有三点变化。一是六部之官为复职，即有一汉员，必有一满员。尚书、侍郎如此，司官也是一样。一般说来，司官掌印为满员，办事为汉员。各院寺皆有“笔帖式”，满语是文书官的意思，专供笔札之事，以满、蒙、汉旗人担任。二是所属机构有部分调整。如户部下设十四司，刑部下设十八司。三是职权小于明朝六部。如吏部的一部分人事权划归军机处，兵部不问八旗军政，只管绿营具体事务，军事调动、命将征伐，则归于皇帝，出于军机处决策。工部主管工程建设，但黄河、海塘等重要工程皆由皇帝指示调度，工部并不过问。乾隆时，六部之外，又增设乐部。乐部管理大祭礼、大朝会演乐及审定乐器音律。设典乐大臣。统领神乐署、和声署、什帮处等。

清代省级行政机构的设置

清代地方省级行政区，设总督为最高长官，辖一省或二、三省。巡抚是省级地方最高长官。管一省政务，地位较总督略低，但仍跟总督平行。督抚皆为军职兼理民政，之下设布政使和按察使。省以下的行政机构有府、州、县。重要的地区设直隶州，直接接受省布政司辖领。直隶州的建置最早出现于元代，明清时期相袭为地方行政单位之一，以直隶于布政司而得名，与一般隶属于府的州不同。在清朝，行政区划的州与厅分为直隶州及直隶厅（厅为省设机构）。其中，属直隶等级的州为统治人口多，事务杂繁者。在编制上，直隶州与府的等级相同，辖下知州、州同、州判等官员都与府等编制相同。直隶州相当于现在的省辖市，与府同级。清朝的州和厅分为两种：其一，是直隶州、直隶厅；其二，是普通州、普通厅，亦称散州、散厅，或属州、属厅。由于直隶州与直隶厅直接隶属布政使司管辖，其制同府，与府是同级的行政管理机构。清代在全国设直隶州72个，设直隶厅34个。普通州和普通厅的地位、规制大致与县相当，全国共设有普通州145个，普通厅78个。

清代军制

清朝军队主要分八旗和绿营两个系统。八旗又分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中侍卫皇帝的称为亲军，由侍卫处（领侍卫府）领侍卫内大臣和御前大臣分掌，而御前大臣持掌乾清门侍卫和皇帝出行扈扈，权位尤重。光绪时，我市武状元卞赓就是乾清门侍卫官。其他守卫京师的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等九营。

驻防的八旗驻扎于全国各重要之地，视情况不同设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官。内地将军等只管军事，而驻扎边疆的将军等要兼管民政。清朝的将军是满官的称号，战时则任命亲王

为大将军。入关后八旗兵很快腐败，丧失战斗力。打仗主要靠绿营兵。

绿营即汉兵，驻扎京师的称巡捕营，归步军统领管辖。绿营的建制分标、协、营、汛几级，标又分为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军标、河标、漕标等，分别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八旗驻防将军、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统率。督标、抚标、军标、河标、漕标都是兼辖，实际各省绿营独立组织为提标、镇标，提督实为一省的最高武官，总兵略低于提督。总兵以下，副将所属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为营，千总、把总、外委所属为汛。

海州的行政隶属关系

清代海州行政隶属关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据《清史稿·地理》：“海州直隶州，隶淮扬海道，顺治（1644—1661）初，属淮安府。县一。”县即赣榆县。康熙一朝此隶属关系未改。至雍正二年（1724年），又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沿革》：“雍正二年（1724年），升为直隶州，隶淮徐道，嘉庆八年（1803年）隶淮扬道。”《江南通志》：“海州旧属淮安府，雍正二年，升为直隶州。又以沐阳县来属，领县二。”县二即赣榆、沐阳二县；《江苏全省两司八府一厅图说》称：“雍正二年，升州，直隶江苏布政司。乾隆（1738—1795）中，分设江宁布政司，又改隶焉。”

这里不妨交待一下。当时苏州是江苏省会，巡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江宁则是两江总督管辖的江苏、江西、安徽三省的地区行政中心。乾隆年间在江宁（今南京）另设了江宁布政使，归总督直管，主要是为了抓住这三省的税赋，其中包括织造税赋和两淮盐税。江苏布政使驻在苏州，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第一副省长（巡抚相当于省长），只管民政。江宁布政司，驻江宁府，受两江总督节制，管辖的今江苏部分有：江宁（今南京）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海州厅、通州厅、海门厅。厅是低于

府的州级行政机构，但不受府的辖领。直隶厅与直隶州的主要区别在于，除奉天的凤凰厅和四川的叙永厅外，一般直隶厅皆无属县，而直隶州一般有属县。雍正二年前，海州为直隶厅，无属县，其时沭阳归淮安府管辖。雍正二年后，赣榆、沭阳两县归海州直隶州管辖。

江苏布政司，驻苏州府，受江苏巡抚节制，管辖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仓州。由此看来，江苏与江宁属不同的地理范畴。有清一代，所谓江苏是指江南的苏州（含今无锡，其时为县）、常州、镇江以及松江（今上海市），海州则属江北地区。

县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基层单位，隶属于府、直隶州。清朝县的设置，时有增减，乾隆时全国设县 1345 个，到清末时达到了 1369 个。县的行政长官是知县，其职权是掌其县之赋税、户籍、诉讼、文教和缉盗除奸等。知县的官阶为正七品，知县之下有县丞及主簿。知县的属官有：典史、巡检、驿丞、闸官、税课司大使和河泊所大使等。

清代海州行政建置

清代海州为直隶州，按清制，由皇帝任命，设知州、同知、州判等州级官员，称“朝廷命官”。知州一员，正五品。又设同知一员，从六品，作为副职，协助知州署理一州政务。又设州判一员，从七品，协助管理税赋和治安。至嘉庆十三年（1809 年），唐仲冕修《嘉庆海州志》时，见于记载的历任知州共有 81 任，80 人（其中唐仲冕离任后又复任）；同知 42 任，40 人，其中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有多年未设同知的记录；州判，顺治朝未设；康熙十三年（1674 年）始设州判；至嘉庆时，亦间有设与未设之事。设儒学学正，正八品，有训导三员辅之，管理一州的教育、考试和州学学宫事务。自顺治朝起，至嘉庆十三年（1808 年），共有 31 任，亦间有未设者。嘉庆朝的翁咸封，在海州协助唐仲冕，大力兴办儒学，

政绩沛然。

道光十五年（1835 年），时任两江总督陶澍阅兵海州，留下两处石刻。其中连云港市花果山风景区三元宫袖海苑内东侧岩壁石刻，从所录同行者中有“海州参将翰海德本、东海营都司丹徒赵云炳”可知，时海州设有地方绿营驻军参将和东海营都司等职位。又从连云区高公岛乡高公岛东北侧龙王庙遗址旁一处石刻上可知，海州曾设淮北盐掣同知一职。（见《云台新志》）

此外，清代海州还在高桥、惠泽各设巡检司一员，皆从九品，负责巡查、防盗和查禁私盐。高桥巡检司负责海州西至今东海驼峰一带治安；惠泽巡检司负责今海州南至新安镇（即今灌云至灌南一带）治安。

清代海州衙门设吏目，管理文书即一般社会事务，如阴阳（风水）、医学、僧道等官，无品级，属同知聘用的吏员。

海州盐官设置

有清一朝，盐业一直是海州的支柱产业，朝廷十分重视。清廷设漕运总督衙门，称“总督漕运部院衙门”，掌管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漕运总督的官阶为正二品，兼尚书者从一品。总督河道衙门是专管南方和北方河道的疏浚和堤防事务的机构，河道总督为最高长官，官阶为正二品。负责盐务的称盐政，各省盐政由督抚兼管。具体管理盐务的机关，由盐运使司和盐法道等部门组成。

海州盐场原属淮安分司管辖，乾隆二十八年（1689 年）改设海州分司，隶属漕运总督管辖，分司机构驻板浦。由此，板浦渐成盐商汇聚之地，盐业经济带动了百业兴旺，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乾、嘉、道三朝以“海州二许”为代表的海州文人群体得以形成，对海州地区文化建设颇多贡献。。

海州分司设运判一员，从六品，盐课司大使从

八品。明代原设的徐渎场，因顺治十八年（1661年）“裁海”而废，康熙二十年（1681年）开复，归并板浦场。明代原设的临洪场、兴庄场，康熙元年（1662年）裁，雍正六年（1728年）合并为临兴场。乾隆元年（1736年）裁去莞渎场，新设中正场，以莞渎废场并入中正场。嘉庆年间海州分司运判辖有板浦、临兴、中正三处盐场。著名清代小说《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的长兄李汝璜就是嘉庆年间的板浦盐课大使。

清代海州的军事防务机构

清代海州的军事防务总体上受驻扎淮安的总督漕运、都院军门统辖。漕运总督为正二品的朝廷大员，都院是指设在京城的“总督漕运都院衙门”的简称，军门是省的最高绿营军事长官，又称提督。也就是说海州防务受漕运总督和江苏提督的双重领导。

清初，淮安绿营标下有左右二营。兼辖淮安城守、庙湾（连岛鹰游门一带）、盐城、海州（城）、东海（今南城一带）五营的海防。海州营，顺治四年（1647年）始设副将，正三品；八年改游击一员，从三品；守备一员，正五品；千总二员，正六品；把总三员，正七品。雍正二年（1724年），拨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入东海营，七年，补拨中军守备一员，添设外委千总一员正八品、外委把总三员正九品，兼辖东海营。清初废除了明代世袭千总、百户制度，在海州由兵部选用东、西（即今云台山与海州）二所千总以统军丁。康熙时，东海营迁移至南城，原有二所兵丁各归州县，两所千总亦裁去。

关于清代海州的防营与卫所。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防》：东海营，驻扎海州东北（即今墟

沟一带）地方，水陆兼防。雍正二年，复设原额守备一员，把总两员，马步战守兵三百八十名。七年，将本营马兵数内拨补外委千总一员，外委把总两员。十年，改设都司一员，添设千总一员，步战水兵二十七名，守兵六十五名。乾隆七年，改续添步战水兵十五名为守兵，二十七年，将本营马兵内拨补额外外委二员。

清代海州的县级机构设置

按清制，海州所辖的赣榆、沭阳两县，各县的行政长官是知县，其职权是掌其县之赋税、户籍、诉讼、文教和缉盗除奸等。知县的官阶为正七品，知县之下有县丞及主簿。知县的属官有：典史、巡检、驿丞、闸官、税课司大使和河泊所大使等。但具体到地方，并非整齐划一。

赣榆，自雍正二年专隶海州，不再兼属于淮安。设知县一员，正七品；县丞一员，正八品；典史一员，无品级；儒学教谕一员，从八品；青口司巡检一员，从九品。青口司即前明荻水司，清移至青口。旧有临洪巡检司，嘉庆时裁去。另有管理社会事务的阴阳、医学、僧会、道会等机构，吏员皆为聘用者。

沭阳，雍正二年改属海州，设知县一员，正七品；旧设县丞一员、乾隆十三年（1768年）复设康熙三年（1664年）裁去的管河县丞一员，正八品，主簿一员，从八品；儒学教谕一员，从八品；儒学训导二员，顺治十七年（1660年）全裁，康熙三年复设为一员。阴阳、医学、僧会、道会等社会组织，各设一吏员管理。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胸海书院）

“一带一路”视野下 地方志工作的供给侧改革

□ 陆瑞萍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以合作共赢为基础，致力于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既为世界共同发展创造机遇，也为中国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道路。各行各业都应围绕这个中心，服务这个大局，找准各自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国有史，郡有志。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在记述一地地情、传承文明文脉、促进历史文化永续利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地方志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李克强总理提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2015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地方志事业规划纲要。2016 年 3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草案，将“加

强修史修志”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面对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背景，地方志工作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资源开发、人文传承、文化交流、地情资政等层面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并以贯彻规划纲要为总遵循，补齐短板，扩大有效供给，加快地方志工作供给侧改革，推动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

一、“一带一路”视野下地方志的独特功用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包括方志在内的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前提保障，甚至是经济合作的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实施，地方志迎来了发展的新空间，也必

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 地方志是信息库, 蕴含大量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史料, 是传承“一带一路”文明的重要载体。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有着绚丽多姿的传统文化。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 在我国已有 2000 多年的编修史。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拥有赓续不断、内容宏富的地方志历史文献。地方志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重要书证。据初步考察, 地方志文献中蕴含大量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资料, 如明代马欢所著《瀛涯胜览》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以及明代中外交通史的第一手资料。有关陶瓷的情况在各地地方志中也多有涉及, 已有《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问世。这些史料的挖掘整理, 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独特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起开始的社会主义时期一、二轮修志,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 地方志融入了改革和开放的时代元素, 与“一带一路”相关内容的记述更加深入。《连云港市志(1984—2005)》将“连云港与新亚欧大陆桥”单独设卷, 以 4 万字的篇幅记述 22 年中新亚欧大陆桥开通运营、世界各国利用新亚欧大陆桥开展货物贸易、人员交流、产业和科技合作的情况。上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 上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源于唐代的青龙镇, 盛于宋元的上海港, 承于清江海关的设立, 延至民国, 上海成为远东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上海通志》从纵横两条线全面、多视角地记述了上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方方面面, 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术与服务社会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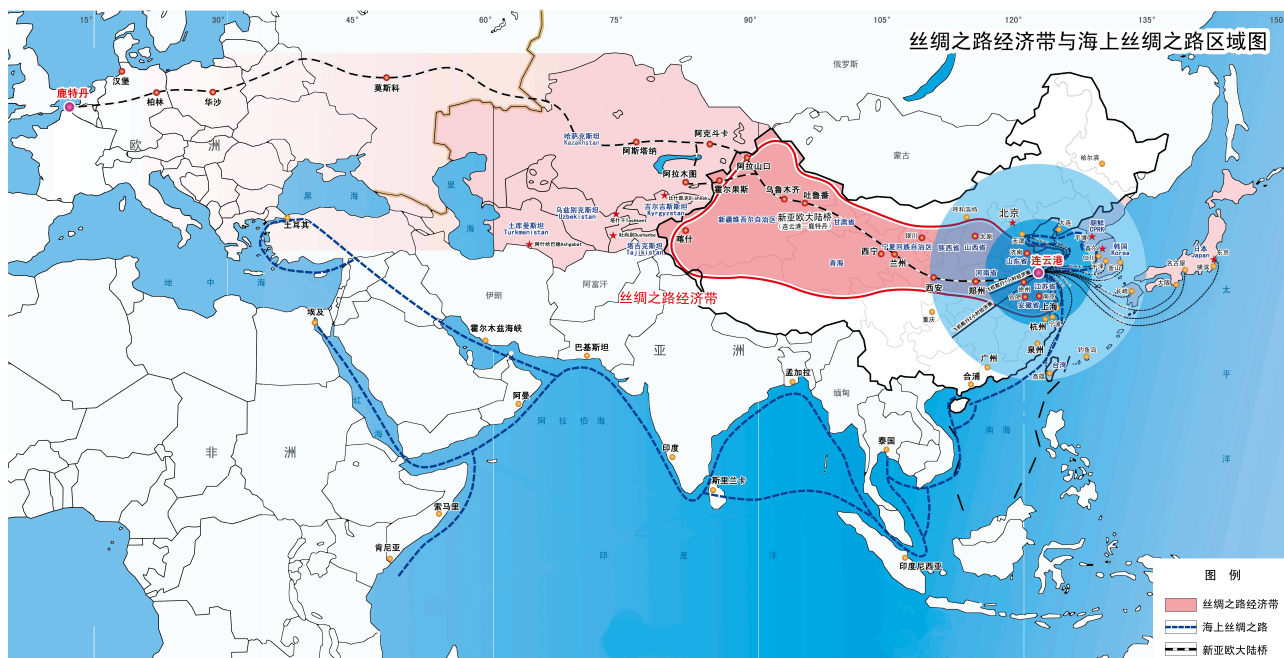
(二) 地方志是教科书, 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政重器。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任职时曾说: “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 就要了解它的历史。

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 这是我一个习惯。”这种以志为信、以志为鉴的认知方法, 源于方志文化的三大功用, 即存史、资政、教化。而资政即为社会方方面面的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历史借鉴, 这是地方志自古至今最重要的功用, 史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是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的全面客观记录的载体, 是历史的客观再现。经验和教训, 得失与成败, 都像一面镜子, 可以给后人以借鉴与启迪, 为领导和决策机关认识地情把握地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近年来, 地方志服务旅游、地名命名甚至城建开发、文物普查的事例屡屡见诸报端, 地方志部门服务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作为“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资政服务, 更应深度把握沿线城市、沿线国家的地情、国情和文化传统、民性民风, 帮助决策机关斟酌制定切合实际、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随着地方志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颁布施行, 地方志工作逐渐告别传统的“一本书”主义, 向志书编纂、地方史编修、年鉴出版、方志馆和地情网建设、地方志资源开发等多业并举、内涵式发展迈进, 进一步拓宽了地方志工作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途径。

二、“一带一路”视野下地方志的供给侧改革

近年来, 地方志工作内涵拓展, 质量提升,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志书、年鉴, 还是新时代意义上的影像方志、方志馆、信息化建设, 都取得了不俗业绩, 获得了长足发展。以连云港市为例, 截至 2017 年年底, 全市二轮修志编纂市志 1 部、县区志 8 部; 出版地方综合年鉴 7 种, 早于全省实现县区全覆盖; 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全面启动, 推进顺利。但当我们放眼“一带一路”, 以



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要求审视地方志工作，不难发现地方志工作在队伍结构、产品质量、资政效益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以连云港市为例，区级地方志机构有机构无编制、队伍老化断层，志鉴工作创新乏力，成果供应端与需求端脱节，地方志理论研究薄弱、对实践引领作用不强等问题普遍存在，亟需进行供给侧改革。

（一）创新供给思维

一是要坚持需求导向。党委政府有什么要求？社会有什么需求？“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地方志研究有什么需求？抓住三大需求，锁定研究目标，确定工作思路，地方志工作就会更有针对性。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找准工作的薄弱环节，带着具体问题开展调查研究，针对具体问题立行立改，比如针对地方志部门研究力量薄弱的问题，可以联合高校相关院系，借助他们的

人才智力优势开展“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研究。这样既解决了问题，也是一个建平台、补短板的过程。三是坚持效果导向。一切工作都要讲究成效，地方志工作也一样。要将地方志工作分解成一个个子项目，落实人员，明确目标，实行项目化管理，加强事前研判、事中督查和事后总结，确保地方志工作扎实开展，确保地方志成果在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中有份量、在地方志系统有影响、在社会民众中得到认可。

（二）创新供给内容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发挥地方志资源优势，全面提升开发利用水平，拓宽用志领域，提升服务大局能力，为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服务。”这一要求意味着“一带一路”视野下地方志的供给侧改革要从改革供给内容出发，让内容发挥主导优势和作用。简而言之，就是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

要的地情文化和地情产品。要积极挖掘沉睡在方志资源故纸堆里的综合地情资料和有关交通、交流交往、资源禀赋、产业产品等方面的专题资料,加以整合整理、开发利用,变“静”为动,变“废”为“宝”。针对境内遗存的多处海上丝绸之路遗迹和考古发现,为充分发掘和宣传孔望山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 200 年的摩崖造像所体现的“佛从海上来”,以及宿城新罗人宅等体现的唐宋时期连云港地区与日本、朝鲜的交往交通史,可以考虑策划《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题。针对当前连云港地情书籍不成体系的实际,策划出版《连云港地方文化丛书》,包括《连云港地情手册》《连云港史话》《连云港风物掌故》《连云港地名故事》《连云港风景名胜》《连云港人物志》《连云港方言》等,兼文兼史,宣传连云港的历史和文化。针对旧志和地情文献散失的现状,策划重排出版《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光绪赣榆县志》《连云一瞥》《云台导游诗钞》等,宣纸竖排,函套包装,填补全市旧志文献系统点校整理的空白,也可以作为市委、市政府接待贵宾的礼品书。策应改革开放 40 周年、连云港解放 70 周年,编印大型画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连云港各行各业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呈现的崭新风貌,展现连云港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前景和投资兴业的良好环境。配合美丽乡村建设,将地方志工作的触角延伸、重心下移,有重点地编纂出版一批名镇名村志,并将乡镇村志的编纂出版与乡村游、农家乐、

民宿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地方志工作服务中心工作的新途径。

(三) 创新供给形式

相比传统的纸质储存,地方志数据库的储存方式具有容量大、介质不易损坏、容易复制等特点,所以要以数字方志馆、地情网、数据库、公众号、手机报等为载体,加快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步伐。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对公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进行分析,针对公众需求提供丰富而充满个性的公共文化产品,实现方志资源的有效供给。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可以在地方志信息化的基础上,整合沿路沿线地情资源,筹建“一带一路”数字方志馆,设立国别资源库、城市资源库、丝路文化库、地图数据库、丝路人物库、丝路风光影像库等分馆,将“一带一路”的信息资源数字化、系统化,从而用活地方志资源,为连云港各行各业对外交流、招商引资提供基础资料。也可以通过到丝路沿线城市、国家举办市情展览等形式,将连云港的风土人情、城市风貌、经济实力、发展重点等介绍到省外和国际。

总之,“一带一路”大视野为地方志工作改革创新提供了崭新思路和广阔空间。我们要把创新作为地方志工作发展的首要驱动力,用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引领地方志发展,为连云港市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志”力。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

地方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用及路径浅析

□ 郭 云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三部分重点任务第一项“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中强调:“加强党史国史及相关档案编修,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这是对地方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作用的肯定,也是对地方志事业如何发挥作用的明确要求。本文结合连云港市实际,对地方志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及主要途径作了简要的分析。

一、地方志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礼俗文化、精神文化等,代表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和普遍认同的思想品格、道德规范和精神价值取向。其中,方志

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 地方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纂修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方志”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之中。《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所列属官中有“诵训”,其职务是“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即负责给天子讲解四方记录上报的史实。《周礼·春官宗伯第三》所列属官中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有“小史”“掌邦国之志”。在其他一些先秦古籍中,也多处提到“志”“前志”“故志”。例如《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大夫申叔时在谈论教育楚庄王太子时,认为要“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由此可见,“志”在当时已是常见的文献,记述范围与功能十分接近后世的地方志。当时的地方志记述内容更为宽泛,记述历史事件、地理风貌、历史人物的书都可归入“志”的范围,从各个侧面反映地方情况。秦朝实行郡县制之后,各

地“志”的编写更加兴盛,形式多样,包括地记、地志、都邑簿、郡书、图经等。东汉时期出现了《越绝书》和《华阳国志》这两种采用横分门类的编排方法,内容兼具地理志、地方史和人物志的史籍,具备了后世综合性地方志书的特征。隋唐和宋朝时期,随着文化的高度繁荣,国家更加重视对地方志书编修的管理。隋炀帝主持编修了中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区宇图志》,唐德宗时期制定了各地定期编修地方志书报送中央的制度,自此官修地方志书的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北宋时期设置“九域图志局”,是有史料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修志机构。此后,历朝历代都采取这种设局修志的办法,“盛世修志”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据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方志8500余种,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明清时期是地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全国现存志书中明志有1000多种,清志有5000多种,在明朝时出现了山水志、名胜志、书院志等各种专志,清朝时期出现了乡镇志、街道志等,地方志的类型齐全,体系完整。清代中叶以后还出现了方志学和章学诚等方志学名家,总结了历代修志的诸多经验,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影响后世的方志理论。从地方志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卷帙浩繁的中华文化典籍中,中国历代志书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形成的修志传统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延续修志传统,开展了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成果丰硕。

(二) 地方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地方志是一地之“百科全书”,对于当地传统文化有着最详尽的记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深厚的内在人文精神。地方志中记载的建筑、语言、戏剧、民间工艺、民风民俗、服饰、器物、饮食、禁忌、传统节日等,是传统文化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旧志有“重人文”的传统,传统文化精神在地方志中一脉相承。地方志数千年

来积累了海量的传统文化历史资料,各地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汇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细部,展现了传统文化浸润下一个真实、生动、丰富的“民间”。

因此,延续修志传统,保护方志文化,将地方志这一中国特色文化传统传承下去,并充分挖掘地方志中的传统文化信息,成为传播传统文化信息的主体和主要参与者,同时加强地方志中对传统文化的记述,保留住传统文化记忆,在志书中凝固传统文化的当代特质,是地方志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方式,也是地方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

二、方志文化的保护

(一) 加强旧志及地方文献的保护整理

整理旧志是保护方志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条例》规定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基本职责之一。据《连云港市方志志》记载,连云港市现存于世的旧志有《隆庆海州志》《顺治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万历《赣榆县志》、崇祯《赣榆县续志》、康熙《重修赣榆县志》、嘉庆《重修赣榆县志》、《光绪赣榆县志》、《赣榆县续志》及《云台山志》《云台新志》《淮北票盐志》;记载地情的地方文献有《古朐考略》《海州文献录》《朐阳纪略》《连云一瞥》等,都是记录连云港历史的珍贵文献。据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江苏旧志收藏整理普查总表》记载,现存旧志原版刻本多收藏于市外、省外,市内仅市博物馆、市档案馆有收藏,地方志机构无收藏。旧志整理方面,比较权威的版本有市历史学会组织点校的《嘉庆海州直隶州志》,199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未再版和印刷,其余旧志点校本为市内地方志爱好者个人点校。地情文献的整理有彭云辑录的《海州文献丛书》,并未正式出版。全市没有完整、系统、权威的旧志及地方文献整理成果,仅有的点校本也因年代久远,查找困难,造成读者对旧志及相

关地方文献的查阅和利用存在较大困难。地方志机构应担当起旧志整理的职责，尽早组织实施该项工作，防止相关资料的继续散失。可以分三个主要方面实施：一是旧志及地方文献资源的普查与搜集。地方志机构要尽可能地搜集旧志及地方文献各种抄本、稿本和刻本，可以利用国内外已出版的诸多旧志目录作为搜集依据。即使搜集实物存在困难，也应了解其收藏者、版本、篇目、现存卷数、保存情况等，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实地考察，拍摄照片，编辑旧志目录及提要。二是影印旧志及地方文献。应遴选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影印出版《连云港市旧志及地方文献刊汇丛书》。还可以与博物馆、档案馆、文物保护所等专业机构合作出版连云港市历史文献丛书。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近期编纂出版了《江苏历代方志丛书》，为旧志影印提供了较好的资料基础。三是选择价值较高的旧志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出版相关丛书，以便于普通读者阅读和利用旧志，对于方志文化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此项工作学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必须要科学制定及实施规划，科学有序地实施。可以申报社科专项课题，申请专项经费，聘请国内古籍整理方面的专家、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参与。地方志机构还必须组织对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进行系统、规范的培训，使其具备相关的古籍整理知识和技能，才能保证此项工作的完成质量。上述整理成果也是建立全市地方志全文检索数据库的重要基础，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实现数字化存储和网络终端全文检索、查阅。

（二）依法修志

地方志编纂是一项系统工程。《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是组织编纂地方志的主体，明确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提供支持”的责任。《条例》颁布的10多年来，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快慢仍然依赖于党委、政府及部门领导的重视、投入程度。尤其是县区、乡镇等基层，领

导对地方志工作的个人认识，决定了本地地方志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政府在其中还未真正担当起责任主体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仅由地方志部门推动工作开展。地方志部门对修志组织不力、“人员、机构、经费、条件”不到位、拒不履行提供资料义务、提供资料不符合要求等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和限其改正的作用，成为制约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是解决地方志事业发展困难的关键所在。政府必须增强依法修志的意识，真正将《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地方政府职责落到实处。当前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体系，由本级地方志部门制定年度目标，将地方志工作完成情况与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实绩评价挂钩，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充分发挥目标管理体系的激励约束作用。

（三）建立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

资料工作是地方志的基础环节。在二轮修志工作中，一些单位入志资料不能及时提供，或者质量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单位资料散失、保管不力，造成了志书中相关资料缺失无法弥补的遗憾。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以后，极大地改善了这种状况，但修志工作时间跨度长，地方志部门对于部门、单位的资料状况缺乏及时、必要的掌握。2014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地方志会议提出：建立和完善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加强地方志资料的集中收藏、保存和管理，逐步构建一个能够全方位适应地方志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需要的地方志资料保障体系。早在2006年，广东省便在全国首家建立了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年鉴与地方志资料年报相等同。广东省规定，年报资料分为概况资料、大事记资料、专题资料、人物资料、文献资料、图片音像资料及其他具有存史价值的资料，并且要求保持资料的原始性。此后一些建立地方志资料年报制

度的省、市要求与此类似。可见,地方志年报资料是最直接记录、反映工作和行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只经过初步整理;年鉴资料是经加工后成型的文字稿件,其要求和内容完全不同。地方志部门也应建立科学的资料管理制度,制定资料年报征集纲目,组织对年报资料进行审查验收与整理、汇编,指定专人、专室集中妥善保管年报资料。对年报资料进行研究,在两轮修志之间编写一些阶段性成果,及时为经济、社会提供服务,也是提高地方志资政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地方志传播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

地方志对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翔实的记载。深入挖掘地方志中的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信息,普及地域文化知识,将地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开展多种形式的普及活动,是地方志传播传统文化的主要路径。

(一) 建立地方传统文化数据库

传统文化与大众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是地方传统文化。中国地域广袤,地方传统文化各具特色,丰富多彩。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建筑、遗址、文物、文献、服饰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礼俗、饮食、特产、节日、传统工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戏剧、曲艺、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其语言方式、建筑风格、服饰审美、心理特点、地理风俗虽等各不相同,却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推崇和认可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人文精神等,挖掘和传播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唤起民众情感认同,传承历史记忆有着最直接的作用。

当前,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地方传统文化有湮没、消失的趋势。地方志中蕴含着海量的地方传统文化信息,地方志部门应当利用自身优势,深入挖掘,建立系统、权威的地方传统文化数据库。在历史上,囿于技术和手段,对传统文化的记载及传承

主要依赖于文字,或者民间的师徒教授、口口相传,令后人无法直接看到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遗憾。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完全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将地方传统文化及一些即将消失、当代仍存在的地方风物完整地记录、保存,以图片、影像的方式呈现,使大众能够直观感受,置身其中,并实现在线检索、查阅。以此数据库为基础,地方志部门可以规划编写地方传统文化知识读本;与中小学校本课程相结合,编写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地方传统文化校本教材;推动高校及职业院校开设传统技艺、器乐、美术、戏剧的专业课程或选修课,使普通市民、青少年通过多种方式接受传统文化信息。

(二) 加强地方志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记述

历代旧志中非常注重人文内容的记述,当前地方志中更注重对经济成就、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记述,对“人”的活动,对当地居民意识、思想、道德、生活方式等记述普遍不足,而这些正是传统文化信息和历史记忆最生动的载体。因此,在地方志编纂中,应注重对于传统文化及人文精神的记述。首先对当地文化遗产应有客观、全面的记述,其次对于能够表现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如自强不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孝老爱亲、无私奉献、改革创新的事件、事迹,加强记述。《连云港年鉴》中曾设“港城故事”专栏,专门记述好人好事及催人奋进的事迹,近年改为记述“中国好人榜”“江苏好人榜”、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先进典型,均是有益的探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镇、村不断合并,老地名不断消失,曾经无比活跃、代表传统文化精髓的乡土文化、民俗文化逐渐消失。为保留乡土文化记忆,国家启动了中国名镇志丛书编纂工程,就是为了保留并挖掘历史智慧。连云港市也全面启动了乡、镇、街道、村志的编修,并要求设物产美食、传统文化、宗谱族谱等内容,着重展现当地风土人情,力图还原、弘扬当地传统文化的原始风貌。

（三）将方志馆打造成为全市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方志馆是记录历史、展示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是弘扬区域文化和方志文化的重要场所。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就提出了方志馆的发展设想，囿于历史条件未能实现。1953年，文化部以山东博物馆为试点，筹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地志博物馆”，成为当代新型方志馆的雏形。进入21世纪后，国家、山东、江苏、江西、广西、北京等方志馆陆续开馆，定位为综合性地情馆，代表了方志馆发展的趋势。2017年6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明确了方志馆是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展示国情、地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这样的功能定位决定了方志馆是展示和传播地方传统文化最直接、重要的平台。充分利用地方传统文化数据库，以文字、图片、实物、视频、多媒体等形式展示地方文献、地方风物、传统器物、礼俗等，展示地方优秀人物、奋斗事迹，使大众直接、深刻感受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行事方式和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方志馆具备打造全市地方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地方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中心的先天优势，对于传播地方传统文化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在市内开展的一些传统文化活动中，由地方志部门开展、参与的较少。方志馆成为全市地方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可以使地方志部门在传统文化活动中成为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方志馆可以与

文化、教育部门、高校形成合作机制，开设地方传统文化讲堂；开展传统技艺制作大赛、传统节日主题活动、优秀传统文化展演活动，推动传统文化的普及。

（四）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传统文化

文化的传播与媒介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进程中，网络、微博、微信等早已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传播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多的机遇。首先应推进传统文化内容的数字化，在地方传统文化数据库的基础上，开发可以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上获取的数字化读物和应用程序，并不断更新内容，使大众能够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参与互动。地方志部门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发布地方传统文化知识，并注重内容的趣味性，以文字、声音、图片、影像、动画等多媒体形式展示，可以有效激发广大受众关注传统文化的兴趣。尤其是在地方传统节日、发生与地方传统文化相关联的社会热点事件时，及时进行深度解读、推送，可以极大促进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的代代传承过程中，地方志既是需要传承的文化传统本身，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重要方式。在新的时代，如何更好地修志、保护方志文化、挖掘及传播传统文化，将是方志工作者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



灌南人民革命纪念馆

对灌南县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思考

□ 韩翠林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型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日渐共融,历史文化在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增强城市发展后劲中的地位 and 作用愈加突显,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重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既可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可持续性的资源支持,有可为发展县域经济注入多元化的文化特质。

一、灌南县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灌南,古称“海西”,文字记载的历史有 2000 多年。境内有大庙汉墓群、中心墩、南闸大墩、白果大墩二墩等古墓葬;龙沟西汉居住遗址、城头西汉古城遗址和上下马台唐代遗址、下马庙唐代遗址、昌姬王殿唐代遗址、莞渎场镇明代遗址等古遗址以

及吴承恩撰写的墓志铭、龙沟汉石刻画像、大庙告示碑、王耀斋纪念碑等文化遗址 48 处，灌南人民革命纪念馆、县英雄广场、海西公园、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乡村游等旅游景点 10 多个，汤沟酿酒工艺、汪氏魔术、淮海戏、淮海锣鼓、五妙水仙膏等文化项目 84 个，汤沟酒窖等文物保护单位 6 处。近年来，灌南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毋庸置疑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保护规划不够完善。随着社会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关注度、要求度的不断提高，促进历史文化活力的再现已成必然。但目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仍停留在对重点文物古迹、历史地段的修复性保护上，对整体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尚缺乏有力措施和科学系统的规划指导。

二是保护机制相对落后。由于缺乏科学的理念，目前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与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缺乏有效机制，在推进全县域美丽乡村建设中，作为地方重要资源的历史文化未能发挥充分作用。近年来，虽然从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但出于收益和产权等方面的考量，社会民间资本的投入依旧没有进入佳境。

三是保护经费投入不足。据了解，在政策上，目前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县级及以下的文物专项保护经费投入不足，加之县本级财政参与较少，导致一些历史遗产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已直接影响了灌南文物、遗产及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使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发挥。

四是保护意识比较淡薄。在推进城市化的进



海西公园

程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有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忽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和协调，使其淹没在“现代文明”之中；有片面强调招商引资，追求商业利益，对一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遵照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条例，缺乏科学论证，主观随意性大，导致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原状或环境风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和破坏。

二、对灌南县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思考

在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历史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把保护利用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文明素质提升等紧密结合起来，依托红色教育资源、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以文化提升旅游、以旅游传播文化，努力开创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共融、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一要完善保护开发规划。要尽快制定完善灌南县科学系统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根据确定保护对象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划定保护区和一定范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出台明确保护措施。将历史文化主要保护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财政预算和领导责任制，在服务发展中不断提升保护工作的地位和水平。同时要本着“保护与建设并重，建设与开发并举”的原则，认真做好县内文物保护单位和古街、古民居的修复保护工作。

二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从调查的情况看，县

内留存下来的许多文物、古迹和景点因年久失修，加之自然的破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损毁现象，如不及时抢救维修，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要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同时吸纳社会资本，按照“立足当前，顾及长远”的原则，在积极向上争取的同时，多方筹集资金，进一步做好维修和保护工作。

三要注重产业与文化融合。在推进全县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打破产业的界限，把农业与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以农业资源、乡村田园资源、乡村风景资源、乡村民俗文化资源、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等为依托，开发旅游休闲产业。同时把第三产业引入农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形成餐饮住宿及文化服务的高级产品与消费形态，同时还要注重挖掘各个村庄的历史遗迹、风土人情、产业特征、风俗习惯等带有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以体现历史凝重感和文化彰显力。

四要加强资源开发利用。要充分利用县人民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农耕文化展览馆、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东郊奇石馆等库藏文物和县内名人遗迹、遗物及诗文等实物资料，对广大干群和青少年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把“热爱灌南奉献家乡”主题行动不断引向深入。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选择适当位置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灌南方志馆，让广大群众和游客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灌南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为提高灌南的知名度、美誉度产生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



1983年12月5日，韩培信（左3）在副市长吴学志等陪同下，考察沿海滩涂、对虾育苗养殖场池塘

韩培信与连云港对虾承包养殖

□吴乃华

连云港市赣榆区沿海的对虾养殖，从开始池塘试养到全面推广承包，仅用了10多年时间。继而历经品种更替、饵料改进和工厂化育苗、大面积养殖，很快推广到全市沿海。30多年前稀缺的海捕中国东方对虾、南美白对虾等养殖产品，终于闯进海内外市场，跃入平常百姓家。我有幸亲历了连云港市“对虾沉浮录”，尤其对时任省委书记韩培信鼓励承包养殖对虾的一段往事难

忘，现摘其要，怀念老书记。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温暖的冬日上午，沉浸在农副业双丰收喜悦的赣榆县（现为赣榆区）城东乡下口村的农民们，迎来了一行“不速之客”，走在前头的便是身着一身黄军服、足蹬解放鞋的省委书记韩培信。他走进建在下口滩涂上的赣榆县对虾育苗场塑料大棚，关切地问：“啥时开发搞的对虾人工育苗？”“培育的规律摸

清楚了没有？”“对虾苗可否供应外地？”，在场的县水产局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并指向脚下暖气弥漫的一方方水泥养殖池介绍说，这个400多平方米的水池内现有4048尾亲虾越冬，可产1.5亿尾虾苗，成活率高达50%以上，开春分苗到室外海滩开挖的虾塘喂养五六个月，就可起捕收获。

韩培信书记听了很高兴，他一再嘱托：“要加快开发”，“要提高档次质量，增加出口换汇率”，更要“让我们百姓的餐桌上，能够吃上我省沿海养殖的大对虾！”

这个村的农民祁德林，前两年开始在自家屋后2亩9分的沟塘试养对虾。头一年收获了135公斤，第二年村里搞承包，村干部让农民们抓阄，巧得很，又轮到他承包了集体拥有的20多亩海滩养虾。到秋冬季节收获成品虾3000多公斤，比合同规定超产一倍，加上他从海上捕捞1500公斤，当年收入3.8万元，净得利2.5万元，家里还盖上了新瓦房。

“谁有养殖技术，谁承包！能承包多少，就承包多少！”韩书记当即指出：“抓阄的办法不好，要改进！”

祁德林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连说：“上面领导的思想可放得开呢！对咱们下面的支持真的很大，市长、县长常来现场看望，见到生产资金没来源，就及时联系贷款相帮。咱还被选为政协委员、省劳动模范呢！”祁德林的邻居们也纷纷至赶来，争说：“老祁家养虾带了个好头，从养虾技术到生产工具，他都帮了不少忙。他在前面走，俺在后面赶啊！”

这一短暂的现场见闻，被笔者记录在案，当时感觉到很有必要动用一次“新闻记者优先”的“长途电话”了！我没顾上吃饭，当晚赶到当地邮政局，来不及润饰文稿，打开采访本，“照本宣科”，一字一句传发给了编辑部。隔一天在新华日报头版（1983年12月7日），读者见到了我现场采写的这一篇新闻特写：《省委书记走访对虾养殖专业户》。

自此，连云港市对虾承包养殖面积逐年扩大，顶峰达到了10多万亩，年产量超过了3000吨！这，都离不开全市广大虾农和各级领导一如既往的共同努力。

（作者通联：连云港市海州区利民路21号3-301）

连云港至大连客货班轮航线的开通与停航

□薛广东

据港口档案记载，连云港在开埠之初即有至青岛、上海等地的海上客运业务，港方亦订有客运行李搬运费率；在随后各个时期，至青岛航线虽时断时续，但一直延续至1960年才彻底停航。至此，除至连岛轮渡外，连云港再无海上客运业务。20世纪80年代，与连云港共同隶属交通部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厦门、广州等国内主要港口都有客运业务，而作为全国八大海港之一的连云港于此却是一片空白。无论是从港口地位，还是从完善港口功能、壮大港口实力、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考虑，连云港都迫切需要开辟海上客运业务，但直至1995年3月16日，连云港至大连客运航线的开通，方才结束了连云港乃至江苏省多年无海上客运的尴尬历史。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条航线开通不到一年即宣告停航。该航线停航后，对停航原因，一时间小道消息满天飞，有说是连云港某官员乘船到大连吃喝拿要，致使大连方面一怒之下停了该航线的，也

有说是连云港口岸单位服务跟不上且胡乱收费造成的。这条航线是怎么开通的？停航的真相又是什么？

“亿万人民的已久宿愿”

连云港开辟海上客运航线提议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根据交通部要求，连云港港务局在对腹地客货流情况进行调查之后，就客运站建设及开辟海上客运航线向交通部提交了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连云港已具备开辟海上客运航线条件。1984年4月，连云港市政府就恢复连云港海上客运航线向江苏省政府递交报告，认为中央已将连云港市列为沿海进一步对外开放城市，连云港市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必将有新的发展，取道海上来连云港市的人员将会大量增加，因此“恢复连云港海上客运航线，设立连云港客运站已势在必行”。同时希望以江苏省政府名义将此

报告转交交通部。1984年5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连云港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也向大会提交了恢复连云港海上客运航线的建议。

1984年7月，交通部在相继收到江苏省政府公函及全国人大转来的代表建议后，责成上海海运局、连云港港务局“对连云港至上海、大连、青岛的海上客流、货流进行调查，并加以经济分析，提出方案意见”。连云港港务局随即组织调查组对腹地客、货流情况再次展开调查，并据调查结果对1982年提交的报告进行补充、修改后上报交通部。1986年8月，根据交通部要求，受连云港市政府委托，连云港港务局邀请交通部海运局、大连轮船公司、大连港务局、上海海运局、上海港务局相关人员来连召开“连云港客运航线商讨会”。此次会议认为，连云港是我国十四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开辟海上客运航线“不仅仅是连云港市三百万人民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连云港腹地十一个省区亿万人民的已久宿愿”，不仅能加强连云港横向经济联系和技术交流，而且对振兴陇海铁路沿线十一个省区的经济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会议指出连云港开辟海上客运航线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没有客运站及配套设施；二是大连、上海的客运泊位及库场紧张，增加新航线势必挤占生产性泊位，影响这两个港口经济效益；三是大连、上海航运部门运力不足，增加新航线需新建适航船舶，航运企业无力承担，同时海上客运成本高，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建议连云港港务局：一是请求交通部将客运站工程项目列入“七五”计划并争取早日实施；二是争取有关单位在船舶运力及泊位使用上给予支持；三是根据海上客运航线普遍亏损、新辟客运航线亏损更为严重的实际，请上级主管部门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这个会议开了3天。会后，连云港港务局将会议情况向交通部作了书面汇报，但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年9月，国家“七五”计划中的重点工程——连云港西大堤工程开工，而连云港客运站建设项目却迟迟没有落地。“亿万人民的已久宿愿”能实现吗？

直达列车带来的转机

连云港因陇海铁路而诞生，港口与铁路似乎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20世纪80年代后期，连云港至宝鸡、上海两趟直达列车开行，不仅改善了连云港市陆上客运条件，也给陷入停滞状态的海上客运航线的争取工作带来了转机。

早在1984年就对连云港开辟海上客运航线进行过研讨的连云港市计经委，在上述两趟直达列车开行后，再次分析了连云港开辟至大连、上海、青岛、烟台海上客运航线的可行性，认为在解决运力的前提下，连云港开辟至大连海上客运航线，在客货流、港方接收条件、经济技术等方面“均已具备条件”。

首先是客流。根据1984年连云港港务局的调查，当时的连云港每年可吸引至大连方向旅客为26.75万人次，按每年递增5%计算，至1989年可达30万人次以上。根据大连港务局、大连火车站等提供的数据，1988年从东北流向陇海沿线的铁路旅客达20.6万人次。如此高的客流量，已远超该航线的需求。其次是港方接收条件。大连港务局认为该航线是具有生命力的，愿提供泊位、货场及其他设施，进行配套服务。而连云港这边，三突堤码头此时已建成使用，该码头东顺岸泊位（7号泊位）完全可作客轮停靠泊位，只需提供候船室等服务设施及进行客运管理即可。

1989年4月，市计经委在考察、调研大连等地并与大连港务局洽谈后，向连云港市政府

递交报告，认为连云港至宝鸡、上海直达列车开行后，解决了陇海、连沪沿线省区旅客来连问题，如果开辟连云港至大连海上客运航线，就能形成“东北三省和陇海沿线省区旅客海陆联运线路”，对促进连云港市与上述省区经济交往，提高连云港市知名度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运力问题，市计经委建议选用载客 800 ~ 1000 人，载货 400 ~ 500 吨的“天字号”客货轮船（长 120 米，宽 19 米，总吨位 5000 吨左右，航速 14 至 16 节），并建议市政府请求交通部协调解决，不行的话，由市政府筹集资金，自行购买。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猛，货物进出口量不断攀升，而与之不匹配的是我国海上货运能力明显不足，加之客运收益远远低于货运收益，因此在当时指望交通部直属企业提供运力支持几近痴人说梦。虽然连云港条件具备，但在交通部难以提供运力的情况下，开辟海上客运航线，连云港人只能望洋兴叹而已。如何才能去掉“运力”这只“拦路虎”？

“中原”号轮为历史画上句号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全国经商热、“下海”潮裹挟之下，众多国企纷纷创办第三产业，当时的中行辽宁国际信托咨询公司亦在寻找商机。经过多次调研和分析，该公司认为连云港至大连海上客运项目值得一试。1993 年 4 月，经交通部批准，该公司下属的大连中洋航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为大连至连云港海上航线客货滚装运输。

1993 年 6 月，连云港市政府召开恢复韩国集装箱班轮航线和开通连云港至大连海上客货班轮航线专题会议，要求市相关方面保持与交通部和大连方面联系，力争在 1993 年年底（最迟在 1994 年上半年）实现该航线通航。会后不久，

连云港市政府及连云港港务局相关人员即赴大连进行商谈。

大连各方对开通航线都表示支持。中行辽宁分行信托投资公司表示愿提供购船贷款，大连交通局表示在手续办理上给予“绿灯”，大连港务局同意提供大连港滚装码头，而非地方码头。大连中洋公司则要求连云港改造码头，落实配套服务设施，做好宣传、揽客工作。另外，考虑通航初期效益不会太好，该公司请求连云港市在各类费用收取上尽可能地给予照顾。对此合理要求，连云港市全部答应。

随即，大连中洋公司即展开购船事宜。起初，该公司选中日本造的一艘 9000 吨级旧滚装船，但因价格问题而最终放弃，转而又选定意大利造的一艘 7000 吨级旧滚装船。因选购船舶耗时太多，该航线并没有在连云港市政府预定的计划时间内开通。直至 1995 年 2 月 5 日，大连中洋公司购买的、被命名为“中原”号的滚装船才从意大利驶抵连云港。

对于这条航线的开通，连云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该航线相关事宜，并成立由经委、口岸委、交通局、港务局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班子，专门负责该航线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95 年 2 月 16 日，时任连云港市委书记的郁家树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专题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抓紧进行各方面工作，确保按期通航”。要求连云港港务局抓紧改造老港区 6 号、7 号泊位，落实好相应配套设施，要按倒计时时间进行作业；要求外轮供应公司抓紧改造候船室，确保在 2 月底完工；并对售票服务、广告宣传、首航仪式筹备也做了一一布置。市委主要领导对一条航线的开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足可见连云港市当时对这条航线是多么地看重。

1995 年 3 月 16 日 15 时 30 分，在鲜花彩旗

的挥动中，“中原”号轮鸣着响亮的汽笛，缓缓靠上了连云港6号泊位。该轮总吨位7222吨，船长131米，最高航速23.5节，设有7层船舱，其中2层车舱，3层客舱，可载货车65辆，轿车80辆，共有床位1000多个。在当时，该轮是我国吨位最大、抗风能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大型客货滚装船。

首航仪式非常隆重，交通部、江苏省、辽宁省、大连市的领导和代表及连云港市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了首航典礼。当天“中原”号轮在连云港停靠一个半小时后，载着850名乘客、96辆汽车离开连云港驶向大连。以时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有为为团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唐贯淮、市政协主席胡为德为副团长的连云港市36人考察团也随船前往大连。在海上客运航线中断了35年之后，“中原”号轮给江苏这个海洋大省却长久无海上客运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无奈的现实

连云港至大连航程342海里，“中原”号轮单航次时间为18个小时。该轮首航后一直执行隔日往返，即：双日从连云港启程，单日从大连返航。1995年7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一篇题为《客轮一夜到大连》的报道，称这条新辟不久的连接中原诸省与东北地区的海上捷径，越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季越吃香，旅客进出港最多一天达555名，几乎天天都有一些想乘海轮的载重车辆因无空位而滞留码头。并称，据该轮政委透露，“中洋公司正考虑在这条航线上增加新的航班，以满足旅客的需要。”

可事实并非如此。在1996年3月之前，“中原”号轮一直正常往返连云港、大连两地，可到了3月份后，该轮却突然以修船为名不再驶向连云港，连云港至大连航线毫无征兆中断。6月1日，

大连中洋公司致函连云港港务局，称暂停连云港至大连航线的营运，“中原”号轮拟调其他航线。

大连中洋公司暂停航线的理由是：“通过一年的营运看，经济效益跟预想效果相差甚远，现营运亏损已达800多万元人民币（不含对购船款的还本付息）。”该公司认为开辟这条航线是打了一个“损失较大的败仗”，而打败仗的主要原因“是单船经营，且公司领导人航海专业水平低，缺乏经营意识”。并称上级主管单位已对该公司失去经营信任，“中原”号轮将面临“卖、转、调”三条出路，而该公司选择的是“调”，即将该轮调至其他航线。该公司承认连云港至大连航线是“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航线”，并称“公司努力争取在一年内能有转机，购置适合该航线的船舶恢复营运”。

而当时，连云港市已将连云港至大连航线实现双船对开纳入了1996年市政府的工作目标。大连中洋公司的做法，无疑给热情高涨的连云港人兜头就是一盆冷水。连云港港务局复函大连中洋公司，希望该公司遵守协议，并劝该公司对停航之举“慎而慎之”。但是大连中洋公司去意已决，“中原”号轮被调至其他航线，从此再也没有来过连云港。

大连中洋公司为什么单方面叫停该航线？原因并非传闻那样。叫停该航线，说白了，就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就拿前面所提《新华日报》的那篇报道来说，拥有1000多个床位的“中原”号轮，旅客进出港最多一天才达555名，也就是说该轮客舱空载率接近了50%，这还是在旅客出游高峰的盛夏时节。据港口档案馆提供的数据，1995年3月16日至当年年底，“中原”号轮搭载旅客57898人次，按每月15个航次计算，平均每个航次的人数仅为406人，空载率达60%以上；1996年前两个月，“中原”号轮搭载旅客4289人次，还是按每月15个航次计算，每个航次的

人数更是少得可怜，只有 143 人，空载率达到了 80% 以上。这么高的空载率，作为依靠贷款购船来投入航线运营的大连中洋公司是无法承受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空载率？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船型所限。“中原”号轮本是环游地中海的豪华游轮，以载客为主，但在国内航线上却以载车为主，而该轮车位很少，虽将部分轿车车位改造成了货车车位，但货车车位仍然不足，致使很多货车来港后无法登船，“甩客”现象严重。二是单船运行所限。车辆来港后需长时间等待，许多司机不愿滞留。三是船龄问题。“中原”号轮船龄偏高，航速减慢，准航率偏低，且时常需要维修，旅客难以确定其航行信息，故在出行上选择其他途径。

尽管当时除了西藏以外，全国各省、市、区均有车辆搭乘“中原”号轮渡海记录，且“中原”号轮平均每航次收入已达 8.5 万元，但对大连中洋公司而言，这样的经营业绩远没有达到其预期值。投入与回报之比过低，是大连中洋公司叫停连云港至大连客运航线，并将船舶改线运营的唯一原因。利益至上，无可厚非，但毋庸置疑的是，此举确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当时，连云港市

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该航线，也正在努力争取实现双船对开，如果该公司能够克服短时间内的困难，与连云港方面一起加大宣传力度，完善营销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并积极争取相关优惠政策，这条航线的客流量一定会大幅提升，经济效益也一定不会比国内任何一条“热门”航线差。

但这就是现实，令人无奈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该航线中断后，连云港乃至江苏省无海上客运的历史再次重演，直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连云港至仁川客货班轮国际航线开通，这段历史方才再次宣告结束。

近年来，为推动南北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和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在更大层面上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及东北经济振兴，开通连云港至大连海上客运航线再次被相关部门提上议事日程，连云港港口集团也成立了大连航线开发工作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连云港与大连，一定能再次“连”起来。

（作者单位：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史志研究室）

赣榆文峰塔

□ 葛永明

赣榆文峰塔，位于六朝县治城里村旧县衙大堂东南首，今赣马高级中学校内，是目前赣榆境内硕果仅存的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建筑。史籍记载建于清光绪辛丑年（1901年），为时任赣榆知县、长沙人徐树镠所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长沙人徐树镠调任赣榆知县，到任后发现赣榆文风不高，自隋唐大兴科举以来，未曾出过“三元”，进士也不多，同治以后再也未有进士及第。而且县城内的孔庙只有一个西门，是建庙时为崇尚西部“夹谷圣迹”所开，没有一个坐北向南的正门。为振文风，弘扬仕气，徐知县翻阅康熙《赣榆县志》得知，县城东南二里许曾有一座青云寺，寺内有座青云塔，为明清江南省十二名塔之一。清初进士董润曾有诗赞曰：“七级接遥汉，八窗含远风。杯传尘界外，人语碧霄中。海国渔樵集，秋胜稻菽丰。晚霞犹逸兴，选胜命花聪。”徐知县在惋惜名塔已毁于康熙七年（1668年）大地震的同时，决定重建青云塔。因原塔址久已荒废，遂将塔址选定在县城内东北角依城而建，光绪辛丑年（1901）建成。砖木结构，八角四层，楼阁式，高14.2米，每层均为琉璃瓦檐，飞檐翘角，角下挂一铜铃，风吹铃响，叮叮当当。门窗无棂，青砖发券，塔门向西，门额上方镶一长二尺，宽一尺的塔铭。文为：“光绪辛丑年冬。东方青龙，卓此文峰，

镇海龙尊，白虎降伏，人民和服，奕世赖福。宦赐显爵，利名高擢，年盛大乐。据城临渊，亘古巍然，我铭永传。长沙徐树镠撰。”此塔因未在青云塔旧址复建，为昌文风，故取新名为“文峰塔”，又因塔角缀以铜铃，微风吹过，叮当作响，民间又称为“响铃塔”。塔西有一月牙形小沟，名“月牙沟”，沟上架一拱形小桥，与西边另一大沟相接，桥名“题名桥”，寓“金榜题名”之意。东西两沟遍植荷花，谓文人学士“映日荷花别样红”，“出淤泥而不染”。过月牙沟、题名桥再西去，便是建在大金山上的六朝县治的衙门大堂，也是万千学子辛苦求学目的之所在。

文峰塔是当年县城内的最高建筑，登塔远眺，东可观赏海景，西可俯瞰全城。尤其是晴天碧日，夕阳西下，塔影倒映双沟，犹如双塔并立，伴随五彩晚霞，甚为奇观。故此，“文峰夕照”曾被列入清代“赣榆八景”。如今古塔尚存，地方政府拨专款进行过恢复性加固修复，在塔基周围石砌三层八角阶梯式护座，以固基础。并公布为县、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昔日古塔已成为赣榆硕果仅存的标志性的古建筑。

（作者单位：赣榆区党史县志工作办公室）



赣榆文峰塔

园林寺

——九庵十八庙寻踪之七

□ 孙大伟

园林寺位于海州城南二里，锦屏山北麓，二道涧出山之处。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明正统二年（1437年）僧正融重修，为一组明代建筑，清康熙年间，知州胡芳先复修。民间传说，园林寺是花果山三元宫兴建者谢淳的弟子园林法师所建，故名园林寺。

园林寺是国内佛教界知名的大丛林之一，其形制规模和比丘之众，在海属地区的寺庙中均为翘楚。首先，是其地理位置极佳。寺址位于锦屏山北麓的一片土岭上，寺门西向，二道涧水出山时如一条白龙从寺南侧经寺门前北去，寺后侧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果树林，寺周围苍松翠柏成片，依山傍水，城为后援。一年四季，僧众身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之中；晨钟晚课之余，湖光塔影为侣，清池皓月伴修。其次，寺庙因山就势，藏而不露，露必生辉。经数百年增修扩建，寺院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规模宏大，计建有山门3间，天王殿、大雄宝殿各5间，另有毗卢殿、藏经楼和法堂、配殿以及附属建筑塔林等。其大雄宝殿，据说是仿照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形制，高大巍峨。山门前有唐朝时所植古柏两株，

天王殿前有银杏两株，给人以气象森严，肃然起敬之感。明代，园林寺曾是朝廷十分重视的佛教丛林。寺内曾出土过记录皇室颁赐某重要佛教珍品的石刻亭柱，文曰：“敕赐园林禅寺永保吉祥如意。天顺六年（1462年）四月八日”。百多年后，明皇室又颁赐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春铸造的重2000斤青铜大钟一口，钟声激扬，空寂远播。寺院如此规模且配置如此贵重之法器可见其名重佛界。1935年出版的《陇海铁路旅行指南》一书，对园林寺倍加推崇，还专门刊登了它的照片。1955年，经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鉴定，园林寺的大殿是苏北保存较好的唯一明代建筑，后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第三，寺内常住比丘达两堂之多。这里环境幽静，面山临水，是参禅悟道的好去处，据说加上常年不断来此挂单的僧人，僧众经常保持在六七十人，可见在佛教界交流之广，影响之大。20世纪80年代后，海州地区旅居海外的不少老华侨回乡探亲时，还经常提出要到园林寺凭吊怀旧。

由于园林寺地处郊外，周围少有居民，僧人为安全计设防较严，加之僧众管理有度，外人无法随



园林寺大雄宝殿

便进入窥其内部奥秘，也造成了一些神秘的传说。例如游客进入寺中南配殿，不知情者一脚踏上配殿门槛，殿中法台上的神像马上立起作击打状，胆小的见状逃之惟恐不及。这组机关附近老年人都知道，直到解放前夕，南配殿倾圮时才不复存在。

另传说寺中有地道通锦屏山以南，这是僧人逃生时备用的。海州民间传说州官卫哲治为民除害，智耙恶和尚的故事，就指此事。传说海州城西北郊的洪门寺恶和尚洪法云，修建洪门寺到园林寺的地道，经常强抢民间美女关入园林寺地道，供其淫乐。卫哲治在海州治他不得，告到皇帝那儿，因洪法云是皇上的表弟，皇上要卫哲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罢了，罢了吧。”卫听后灵机一动，口称遵旨，

回到海州将恶和尚埋站土中，只露出光头在地面上，用耙地的钉耙耙死，为民除了一害。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在锦屏山砍树修工事，怕僧人了解其军事秘密，将僧人全部赶走，庙宇无人管理，此后便一直没有僧人居住。新中国成立后，虽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并一度为东海县干校校址，但此后无人维护，损坏严重。1959年修建园林水库，寺中建筑基本被拆毁，仅存一座孤零零的西配殿。20世纪80年代，水库扩容，西配殿也被拆毁，大雄宝殿作基础的条石都被挖出他用，千年古刹在世间彻底消失。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摆架子

□ 潘友国

官员摆架子，古已有之。

摆架子，又叫摆谱、摆门面、拿大。

寒假里的一个冬夜，窗外的雪花漫天飞舞，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干脆点灯读古史，无意中读到一个故事。

明代江东伟撰写的《芙蓉镜寓言》一书中写道：明代有一长沙人在京城当官，牛气的不行，每次回乡志气盈满，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宾至鼓吹，喧阗里中，摆着一副臭架子，生怕老家人不知道他衣锦还乡。

民间有一句歇后语：“屋梁上卖猪肉——好大的架子。”是挖苦摆架子者最佳的句子。

而我的老家也有一个故事，只不过跟上面的故事恰恰相反。

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乡人卞赓考上武状元，赏戴花翎，授官一等侍卫，巡守神武门。

卞状元为人低调，少张扬，多谦和，不狂妄，官大也不摆谱，努力做事，平易近人，对下属也有容人雅量。他的品行一直被老家人所称颂。

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离家十里地时，远远看见父老乡亲夹道欢迎，就立即下马，抱拳作揖，口中谦恭地说：“鄙人不才，能有今日，全靠父老乡亲的教诲和栽培，感谢各位盛情。”

两个故事，相比之下，一目了然，截然不同，让我唏嘘良久。

我尤其欣赏后者。

在老家历代名人中，我素来崇拜和敬仰卞赓，与状元为邻，我倍感荣耀。

追溯后一个故事的源头，与我的父亲有关。

记得小时候，坐在皂角树下，听父亲时常讲这个故事。父亲讲完后，还总是像一个老太婆，絮絮叨叨，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叮嘱我。

“孩子，为人要谦虚，要正直。”

“嗯。”我嘴里应着。

“做人做事要像卞赓那样。”

“嗯，大（板浦方言，父亲的意思），我记住了！”

我从小，乃至长大就受着这样的家训。

如果说我现在，在单位能与各位同事和谐相处的话，不得不感谢我的父亲。

父亲虽然去世很久了，但父亲讲的故事以及说过的话，让我终生受益，永难忘怀。

（作者单位：海州区板浦初级中学）